



闽 都 文 化 掠 影

龙潭角前三县洲

唐希文/图

闽江分港后的白龙江在靠近古城南流域附近时，南岸巨大的花岗岩山体突兀江面，形成了一座临江高台，与北岸的钓龙台隔江呼应。人们相信，台下便是龙居处，称之为“龙潭角”。信了“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箴言，这里自古成了干旱时节人神对话的风水宝地。留有五代十国时陈靖姑的千年祈雨台和放生处，向天祈雨，向水放生。祈雨须放生，放生为祈雨，大自然的生态因此保持平衡。

明成化年间，一场洪灾打破了自然界的平衡，水从上游“搬运”来一片沙洲，沉积在龙潭角下。洪水退却后，福州府管辖的闽县、侯官县、怀安县的三县村民竞相登洲围地引发械斗。三个县的县太爷各自为民作主，相持不下，只好由福州府判定该沙洲由三县共有共管，定名为“三县洲”。三县居民安居乐业于岛上，建造、耕耘、养殖、渔获……水上疍民更是日航夜泊。

1975年，三县洲被辟为江心公园。洲岛上林木葱郁，四面环水，是天然的游泳场。1992年，公园配备了悬索桥，结束了轮渡进岛的历史。在福州几代人的心目中，它是少年人的“欢乐岛”，老龄人的“养生岛”，还是一座年轻人的“爱情岛”……

目 录

往事追忆

- 4 我经历的1978年中考 / 陈高英
- 6 我的天堂电影院 / 行摄无限
- 10 新民街东南里八号 / 蔡 林

文苑艺林

- 16 甲申、甲午海战及其历史教训 / 郭 震
- 24 海事维艰 臣心如铁 / 林丽钦
- 25 冯梦龙笔下的福州古代“七夕”故事 / 王 凌
- 27 糖、兵与海船：马可·波罗的“福州记忆” / 刘洪哲

十邑纵横

- 31 福州琅岐说董家 / 董山静
- 35 福清人为何爱闯荡东瀛 / 何华龙
- 39 古厝背后的传说 / 林展飞
- 45 话说闽清会馆 / 石丽钦
- 47 狮子峰下榴花洞 状元故里东山村 / 杨济亮
- 53 寻访拔仕官路 / 叶 红

人物春秋

- 55 林寿图书院教育一二事 / 陈常飞
- 58 客居台湾福州人抗日团体及忠贞人士谱 / 郑宗乾

封面：活跃在罗源山区的农民电影放映队（1984年 林振寿 摄）

彩插：螺洲孔庙（文/图：薛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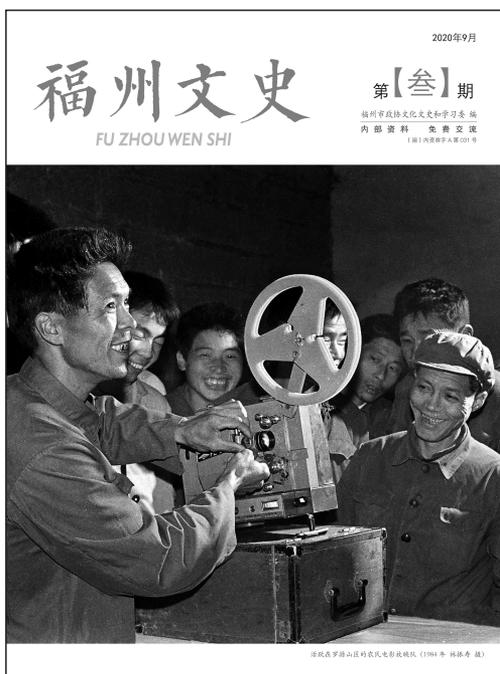
封底：张斌篆刻

FU
ZHOU
WEN
SHI

福州文史

2020年 第三期

(总第五十四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 管：政协福州市委员会
主 办：福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福州文史》编委会

主 任：林恒增
副 主 任：林绍彬 林 澄 张大斌
委 员：陈高英 杨 凡 卢 玲
李大林 陈泽山 张振玉
李仲才 唐 希

编 辑 部

主 编：陈高英
副 主 编：卢 玲 李大林
编 辑：陈泽山 唐 希 潘 登
地 址：福州市五四路125号
邮 编：350003
电 话：0591-87808927 87831257
传 真：0591-87816430
电子邮箱：wswb@sina.com
印 刷：福州雄胜彩印有限公司
刊 号：闽内资准字A第031号
排版设计：福州乐彩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数量：1500册

发送对象：全国政协各地内部系统单位、福州市
政协委员、福州市参与政协文史工作
的爱好者

我经历的1978年中考

◇陈高英

一年一度的中考转眼又到了。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做好防控的同时又要保障考生的复习和考试，使今年的中考显得特别，给考生和家长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使我想起了1978年的中考，它是恢复中考之后的第一次，带有很深的历史印迹和历史意义。人们对恢复高考记忆犹新，而对中考何年恢复，怎么考法，如何录取，多数人并不知晓。我有幸参加了42年前恢复后的第一次中考，有些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将此回忆记录下来，以飨读者，特别是献给那个时代的莘莘学子。

1977年恢复高考，社会反响很好。紧接着1978年就恢复中考，即初中升高中的考试。这一年的中考，与后来的中考又有所不同，考试分为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化学等五个科目，满分400分，其中数学、语文、政治各100分，物理60分，化学40分。考前填报志愿，首批录用中专，如没报考中专的高分录用县一中，其他按分数就近录取入学。除了应届初中生报名参加外，往届初中毕业生甚至高中毕业生也因报考中专而参加考试。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毕业后国家分配进入干部队伍，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就出现民办或代课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参加中考的有趣现象。正因如此，当时有的中专特别是师范学校生源非常好，无形中为后来培养较好素质的公务员和教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国家、社会、家庭开始重视教育，那一阶段初中适龄少年增加较多，大部分公社的中学已经满足不了初中就学的需要，就在公社所在地中心小学或者其他较大的小学开办附设初中班，俗称“戴帽初中班”。我的家乡连江县筱埕公社筱埕大队，开办有筱埕中心小学，该小学在1976年开设初中班，我就从中心小学直接升入初中班，成为其第一届学生，也有幸成为恢复中考后的第一届考生。小学设立附设初中班，必须增加教室，学校非常迅速地在操场旁建起一层共四间的教室，先建好的两间作为第一届附设初中班教室。应该说教室条件在当时算不错，我们同学都很珍惜。

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高考制度的恢复，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加上当时对陈景润等科学家的宣传，唤起了全社会对人才、科技、教育的重视，青少年对知识的追求、上大学的渴望是空前的。绝大多数家庭开始重视孩子的学习和培养。学校也很及时地抓住上级的好政策，开办附设初中班、新建教室就是很好的例证。学校对附设初中班在教学、管理上也高度重视，在师资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配备了教学水平相对高的老师。老师的责任感很强，积极性很高。学校采取晚上集体备课等形式，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绝大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高，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后，经常围着老师提问课堂上及平

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都要到下一节课铃声响起时，学生才坐到座位上，老师才离开。

学校从初一开始就鼓励我们成立课外学习小组，由七、八位同学自愿组成，在学习条件相对好的同学家中，每晚或者周末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我和几位家在附近的同学组成一个小组，设在一位姓杨的同学家。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很支持，对我们很热情，时间长了，我们在他家学习就很自然随便。一到晚上或周末，我们都集中到他家，围着他家的大饭桌读书、做作业，有时相互讨论，同学之间友好和睦。校领导和老师也会不定期到各学习小组，关心我们，并解疑释惑。学习小组在促进学习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在学习小组一起学习，大家都感到有趣快乐。我们所在学习小组另一位姓杨的同学家就在旁边，他父亲做鱼丸生意，鱼丸制作得特别好，每天晚上制作鱼丸和滑鱼汤，我们也会劳逸结合，在学习间隙松动一下，特别是围着杨大伯，看他打鱼丸，了解打鱼丸的基本动作和程序，感到非常有趣。有时花一角钱买一碗刚出锅的鱼丸或滑鱼汤解解馋，如果身上没钱，杨伯伯会让你先吃，改天有了钱再还。这段经历，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家乡美味记忆及家乡人勤劳、善良的美好记忆。

初二下学期，是中考的冲刺阶段。学校领导和老师更加重视，晚上将同学集中在较大的教室内，先安排老师辅导，然后组织学生学习和讨论，老师随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时候，各科任老师都会来到班上，校领导也经常前来鼓劲。许多男同学学习迟了就不回家，在班上睡，将桌子拼起来当床铺，天气热、蚊子咬，也影响不了同学们的学习和休息。

我的家乡地处黄岐半岛东南部，民风淳朴，学风浓厚。两面临海，有美丽的海滩和60年代学习东山县种植长成的一片木麻黄，没想到，这些也成为我们学习的良好资源。早上或傍晚，许多同学到海边借着凉爽海风背书朗读。浅海上渔民在捕捞作业，海水的浪涛声和同学们的读书声交集，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尽管当时没有摄像机或照相机将此美景拍摄下来，但它永远地铭刻

在我们的脑海之中。我们的教室只有一层，夏天特别热，下午尤其难耐。记得有个下午上数学课，天气实在太热了，有几个同学提议移到木麻黄林中上课，得到老师的准许，将木制黑板搬到林中，放在较低处，同学们借助坡度互不遮挡，还可以背靠着树木，在地上的沙土上做简单的运算。如此有趣的场景，如果换在今天，肯定有不少人拿起手机记录下来，传到微信朋友圈，很可能成为热搜或网红。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大家一心一意专注于学习，只想到林中阴凉且海风清爽，这样听课很舒服。今天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十分惬意和幸福。中考前的学习看似紧张辛苦，而因有这些有趣的事，使我们感到充实快乐，这也是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忘记它的重要原因。

在紧张有趣的复习中，我们迎来了中考，也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重要的考试。考试在7月份，考场设在筱埕中学，我们三三两两地结伴到筱埕中学操场等候，不用家人接送，只带着钢笔等简单的答题工具，同学们很认真对待，但不显得紧张。考室内没有电风扇，考试时并未觉得酷热难耐，可能是我们专注于答题，或当时大家较耐热的缘故。四场考试都很顺利地结束，没有出现异常情况。最后一场考完，许多同学就结伴去后沃沙滩上游玩和讨论考试情况。在等待考试成绩揭晓的日子里，同学们经常结伴到村东山上游玩，或者去海里捡螺，放松心情。

中考成绩出来，我们两个班除了个别同学考上一中外，相当一部分同学考上筱埕中学高中部。筱埕中学原先只办初中部，念高中须到三十多公里外的连江五中就读，很不方便，同时就读机会也少。因此，从1977年开始办高中部，收两个班，这样，我们更多同学就有机会念高中。现在回头看，筱埕中学办高中部的那几年我们镇走出来的人才比较多。我们由衷地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好，感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校落实也很及时到位，感到非常庆幸和自豪。可以说，我们是恢复高考、中考制度的得益者，是时代的幸运儿。

（此文写于2020年7月）

我的天堂电影院

◇行摄无限



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

意大利名导演朱塞佩·托拉多雷的《天堂电影院》中，小男孩多多非常爱看电影，把妈妈给的买牛奶钱偷偷花在电影票上挨了揍。教会电影院的放映师老爷爷艾弗雷多出手救了他。爱电影的人没有不喜欢《天堂电影院》的。

我的天堂电影院是小时候福州老家的八一剧场。这剧场原名东街口文艺戏院，1928年由林徽因辅助林天民设计的。1949年前是城里最大的剧场，除了演话剧、歌舞，也放映电影。解放后军管了，改名为八一剧场。

说起看电影，在20世纪70年代可是件相当兴奋的事儿。那时物质匮乏，孩子们几乎没有零食，一年里最盼望的就是过年特别供应的那包年糖年饼。而文化生活单调，没有电视、网络、游戏这些如今大家熟悉的各种文娱活动，电影院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堂。

首长专座上的两个小姑娘

“文革”开始后，苏联电影、西方电影以及整个五六十年代的国产老电影全部被打成封、资、修大毒草，遭到批判，被封存了。八亿人民只剩八个样板戏可看。还有不多的几部红色电影。一张电影票要两毛钱，以那个年代的物价，比一顿饭还贵，看电影是件很奢侈的事，是吃大餐！

与其他人相比，我是幸运的。我的中小学时代，每天晚上几乎都在剧场度过。我妈妈受姥爷影响，从小也是在剧院泡大的。她在做文学编辑之余，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些小节目。每年都被选拔去参加汇演。当时我妈妈的节目常常在市中心的八一剧场上演。晚上我也就跟着去看演出。

八一剧场经理的女儿正好是我同学。因为两家家长是朋友，一来二去，两个小姑娘也成了好朋友。她告诉我一个剧场的头号秘密——剧场的前几排并不是最好的座位，因为舞台上



跳舞会扬起灰尘，灯光一照，可夸张了，比雾霾还严重（脑补一下，那是没有吸尘机的年代）。

第八排中间有那么几个座位是他爸爸留给军区首长的，永远不卖票。而大多数时候没有首长光临，这些座位就空着。于是，灯一黑，我们两个就偷偷溜到那个座位上，欢天喜地地当起了“首长”。

如果真的有首长出现时，我们马上溜回她在剧场楼上的家。家里有个小木窗，就在放电影的窗户上边正对舞台的地方。我们搬张板凳，打开小窗，一遍一遍地观看着少有的几部电影和“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xx周年”的文艺演出。

我们和多多一样常在小窗后面看电影

我们还有坐到幕布后面看电影的经验，与幕前看到的电影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幕布后看到的人物动作是反方向的，电影里的人全是左撇子。

国产电影少得可怜，每部电影我们都看了N遍，重复率如此之高，肯定是吉尼斯纪录了。

当年有人抖机灵，把仅有的几部故事片名编成故事：“我是《小兵张嘎》，来自《鲜花盛开的村庄》。在《摘苹果的时候》，在《艳

阳天》下，我们佩戴《闪闪的红星》、吹着《小螺号》，走在《金光大道》上，参加了《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狠狠地《打击侵略者》。我们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奇袭》《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我们《南征北战》，打了《伏击战》、《地道战》和《地雷战》。在《卖花姑娘》的帮助下，《英雄儿女》们展开了《难忘的战斗》……”

偶尔进口几部国外电影，基本也只来自社会主义小兄弟的。那时人们根据外国电影风格还编了个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的名声，来自一部《多瑙河之波》。电影里的拥抱、接吻镜头不少。在那个禁欲的革命年代，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很多部队单位在放映时，放映员总是用一张纸板临时把这些镜头遮掉，搞得好奇的年轻军人们，浮想联翩，心里痒痒的，就想看那几个被遮掉的空白画面。好不容易等到假期，乘车几十里进城来就为了补看那几个镜头。超值！回去还能跟人吹上好几天。

把中国电影总结成《新闻简报》其实也很真实。《新闻简报》记录片的内容大都是毛主席会见外宾。这不，连纸老虎美帝都屁颠屁颠来了。如果外国电影是四菜，《新闻简报》就是中间那碗“青龙过海”清汤（白开水加根葱，滴两滴香油）。

大家最爱看的是当时在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中国各地访问（好像今天那些没钱去旅游的爱看别人微信里的旅行图片一样）。亲王和太太莫尼克公主的贵族生活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



八一剧场（福州老建筑百科提供）

电影中的经典暗号

因为电影数量少，翻来覆去地看，每部电影的情节、对白，几乎都已经倒背如流。小孩间最常用的联络暗号就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台词：“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多年之后，我还用它识破了一个假冒大陆同胞的新加坡华人。他中文虽好，就是答不上这联络暗号。

肚子一饿，还有人给你念《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台词：“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给人让路时会说：“让列宁同志先走。”

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有一个情节：有人替人介绍对象，拿了一张姑娘的照片对小伙子说：这个姑娘非常能干，一年能挣600个工分。这时导演给照片一个特写——一个很胖的女孩。全场的观众哄堂大笑。从此，有人就把胖女孩叫做“600工分”。

放学回家开门就喊：“我胡汉三又回来啦！”（《闪闪的红星》中恶霸地主胡汉三的台词）

拿到成绩单，就说：“高，实在是高！”（地道战里的伪军司令台词）

还有什么“马尾巴的功能”，“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等今天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当时大家听了都会会心一笑。

电影少，女演员少，长得不革命的女明星更少。《海霞》的扮演者吴海燕是个京剧演员，一个白白嫩嫩的上海姑娘，尽管大家都觉得她半点也不像风吹日晒的海岛女民兵，可拦不住大家喜欢美女啊。我的好朋友长得有点像她，顿时也成了当地的小偶像，走在路上，不少人指指点点：“看，小海霞！”太自豪了。

小小电影审片员

打倒“四人帮”前，其实就有内部电影。那年头内部的事挺多，内部电影就像“内部文件”“内部特供酒”“内部香烟”，非常吃香。观摩内部电影名曰批判反面教材，但实际上已经成为高干特权阶级的文化活动。就像现在女孩嫁人想嫁有车有房的，当年能嫁个看内部电影的绝对是首选。

打倒“四人帮”后，老电影逐步解禁，电影公司成立了一个“内部电影审片小组”，把片库里的电影先在内部放一遍，决定哪些可以解禁，哪些还不行。我妈妈正巧是审片小组的成员。我就跟着沾光，赖着跟她一起去“审片”。

一大批内参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中途岛海战》、《巴顿将军》、《攻克柏林》、《山本五十六》、《画皮》、《魂断蓝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简·爱》、《红菱艳》，《基督山伯爵》和《飘》等，依次登场。

有些电影，还没有译制，只好找了一男一女两个同声翻译现场直接口译。口译的速度跟不上，很多时候，有一句没一句的。搞得不懂外语的观众看得云里雾里的，莫名其妙。可是久旱逢甘露，这些片子比样板戏好看多了，让人趋之若

鸯、津津乐道，充满观影快感。那年头谈恋爱的，基本都在谈电影。

从前那些被批判的毒草电影，像《刘三姐》和《阿诗玛》，歌美、景美、人美。我压根也没看出毒在哪里。东方美人阿诗玛（杨丽坤饰）随着电影上演，马上变成新的偶像，取代了女民兵海霞。她的剧照被贴在每个姑娘的房间里。估计也贴在了男生的春梦里。

不久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妈妈让我专心备考，就不许我再去看电影了。对我来说看电影比考大学重要多了。和她吵闹也没用，我只能用报考电影学院编导系来安慰自己，如果我考上了。天天看个够。

紧接着，我妈去劳动改造。我那时才15岁，也不知道发愁。爸爸在外地，家里没有大人，我一下子又自由了，拿着妈妈的审片出入证，每天晚上大摇大摆地去看两部电影。坐在我身边的是

熟人，省报李总编，他的女儿是我的班长。大叔见我坐在那里看电影，吓得不轻，问我，只剩下4个月，你不考大学啦？我看也不看他，只盯着电影银幕说：考啊！考电影学院。

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奇特的电影的狂欢时代。电影院里开始放通宵电影。一个晚上4部连放。放到第三场，就有人开始歪脑袋打瞌睡了，到了第四场电影，90%的观众都在呼呼大睡。可通宵电影票还是卖得很好。

光阴荏苒，如今八一剧场早已被拆了，取而代之是充满现代化商业气息的购物中心。每次有机会经过那里，我还是会不禁回忆起当年的无数快乐。在我心中，那座古老的天堂影院仍然还矗立在原地。当年，那个老剧场，那个首长专座，真是文化沙漠里的一块神圣的绿洲，种下了我多少梦的种子！那些幸福快乐的电影记忆让我的童年少年金光闪闪。



依次为《智取威虎山》《小兵张嘎》《芒果之歌》《刘三姐》《卖花姑娘》《600工分胖妞》《阿诗玛》《海霞》宣传照

新民街东南里八号

◇蔡 林

闽江流经福州城，在南岸有个称为“泛船浦”的地段，明朝时期划为番船锚地。“泛船浦”为“番船浦”之谐音。这一带西起大岭东的舍人庙，东接菖蒲墩，岸线约2公里。随着滩涂淤积，闽江疍民多在此泊船、聚集。

五口通商，泛船浦沿岸洋行林立，直面洋务，港口功能得以提升，劳力资源得以开发。咸丰十一年（1851）五月，英国在泛船浦设立闽海关（洋关），1862年，闽江边海关楼前建成了第一个能停靠机动船的码头，称“海关埕”码头。

“海关埕”码头东边是“义和埕”码头，紧挨着有一宽大平坦向北坠入江水的石铺道头，称为“新街道头”。人们从道头劳作带上来的闽江水水迹自北向南，印洒在长约二百米的石板路上，湿漉漉地延伸至南端，铆入自西向东通往菖蒲墩的新民街。新民街东南里8号就坐落在这“新街道头”路东侧一隅。

这里挤挤挨挨的住着不同层次的居民，有陆地原住民，有依托江海为生，上岸陆居的“疍民”。有富裕人家中西合璧的大屋，也有原住民传统柴埕厝，更有上岸船民的干栏式吊脚楼、架船屋。虽繁杂，倒也丰富多彩、错落有致。

我少时玩伴碧，她和他的庆字辈兄弟们，曾是新民街东南里8号唐姓家族后裔的一支。在她父母家的单元房，看到了她爷爷留给她弟弟唐庆平的家族资料。

这是一张摄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唐氏家族合影，作为背景的建筑即新民街东南里8号唐氏原宅。祖孙三代26人，中间端坐着老太爷唐天德和太奶奶江木香。这是一个搭上洋务快车上岸陆居的“疍民”家族。

（一）

“疍民”这个群体的相关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年，闽越国被汉武帝灭后余部迁往江淮地区，闽被“尽虚其地”。遗民中不甘离去者，或隐入山林，为畬族；或泛舟水上，成疍民。厦门大学历史系傅衣凌教授在《福建畬姓考》中做了分析：“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畬与蜒实推巨擘，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爰分为二，实则一也。”他们族群行踪遍及东南沿海，远至东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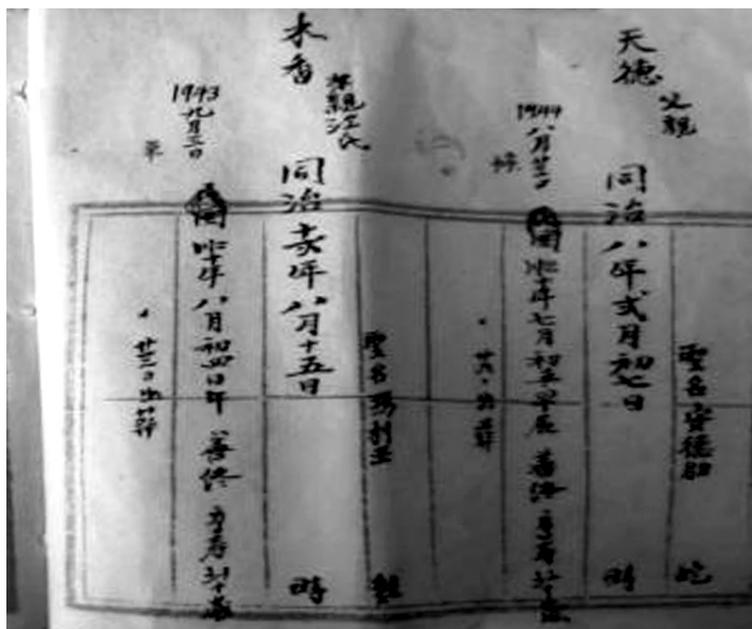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新民街东南里8号家族合影（唐庆平 供图）

亚，甚至迁徙到南太平洋诸多岛屿上。

历经两千多年，为数不少的汉族大姓或联姻、或避难、或走投无路，也或向往“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自由等，融入百越遗族的疍民世界。汉人入疍带给水上居民血脉和习俗。尤其近现代，疍民在社会帮助下上岸居住，有了土地，过上农耕生活。上世纪50年代初，认定疍民群体为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上岸后的疍民多以农耕文化自认，寻找来自中原的祖先，延续了大族的族谱。

泛船浦的唐姓大都说祖上来自闽侯南屿尧沙。溯源唐氏可追至西周，年幼的周成王“言出必行”桐叶封弟，弟弟叔虞受封为唐姓一世祖。唐末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唐绮随王审知兄弟入闽繁衍，后人多聚南屿尧沙。千余年来后裔几经迁徙，据族谱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一支源自尧沙的唐氏落难，遁入水上，泊船闽江下游“远洋鼓山边”，开创了福建水上人家中的唐氏家族。

同治五年（1866），教会派意大利传教士Gentili往台江和南台岛一带传教，他先在泛船浦对岸“台江鳌峰洲上搭建一间木屋，通过施舍义诊、泛舟讲道，吸引泊居于闽江两岸的水上渔民、船民信教”（《仓山宗教文化萃编》，福州仓山区政协编）。除了以医疗、教育吸引疍民信教外，传教士Gentili还亲随疍民船，用带着洋腔的闽东方言解说信条。这些洋腔方言让闽江下游疍民产生不少联想，以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来理解高鼻深目人口中吐出的语音。意大利文名字Gentili在福州语中传成了Hendili“很得理”——“宏治李”，依照洋人姓氏在后的习惯“宏治李”变成李宏治。



自此，福州疍民天主教徒人数迅速增长。1868年，李宏治获得教会的拨款，在闽江下游“滩涂淤泥之地”的泛船浦建起可容纳大约五百人祈祷的木构泛船浦教堂与神父楼。

话说东南里8号唐氏祖，正是闽江下游北岸“远洋鼓山边”水上“奉教唐”这一支的后裔。1866年的某天，太祖爷爷唐春莲接受了神父李宏治亲手用闽江水做的洗礼，取圣名“伯多禄”，意为“坚如磐石”的人。五口通商，福州茶港兴盛，泛船浦直面洋务。这位“坚如磐石”的父亲不甘祖辈历尽困苦的水上生活。

为了改变命运，他带着唯一的儿子唐天德来到南岸的泛船浦，凭着勇气和祖祖辈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航行经验，加入为洋行打工的行列。

此时的泛船浦时过境迁，闽江水从上游裹带来的泥沙在下游淤积。明朝划出的番船锚地“泛船浦”已无可泊大船的深水码头，外国轮

船只能停泊在离福州16公里外的闽江下游的马尾港（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为闽江下游的水上人家带来了机遇。他们“善于行舟”的优势得以发挥。

翻开福州“大桥”的老照片，桥下江面上，挤挤挨挨的疍民船在晨曦中随波飘荡。他们在等候着召唤，把泛船浦沿江码头货物运往16公里外的闽江口，供给等候在那里的远洋轮船；再等着，将到港的大轮船上的货物化整为零地运回泛船浦码头仓库。

当年，福州作为世界最大茶港，疍民成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这一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适逢西方传教士的宗教渗透，漂浮不定的生活似乎有了精神寄托。他们中大部分人不太计较福州被迫开埠的耻辱，不像陆地居民那样敌视外来文化的入侵，几乎整体地接受了天主信仰，日日诵祷，感恩上帝，以善良之心，竭尽全力地为东西方商贸服务。由此，他们之间部分人获得洋人的亲睐和信任，成为搭上洋行商务快车崛起的浮江讨生活的一代。

照片中的老太爷唐天德出生在同治八年（1869），他随父来到泛船浦时，正值海关楼前的海关埕建起第一个机动船码头不久。紧挨着海关埕东边的义和埕，是属于一个有实力的洋商，沿江建了多座仓库和配套建筑，当地人称那范围为“义和仓”。

唐天德自幼聪明，在教会里学了简单的英语口语，十二三岁跟着父亲学习洋人轮船上的标

识。成年后，凭着血液里征服浪涛的勇气和熟悉的航路，在水上运输繁荣时代，供职义和洋行，成为开轮机的“大车”（相当于轮机长）。当时洋行依了疍民群体的技能、语言等特殊层次，认可父传子家族式培训，后经过考试获得从业证书。唐天德的二儿子唐木银与四子唐木财少年时代就是随父唐天德学开轮机，子承父业进入了义和洋行。唐木财的孙子唐庆平说他爷爷是开机动缉私船的轮机，虽然不甚理解义和洋行为何有缉私权力、任务，但是月俸大洋八元，高出同期供职洋行的中国职员，足见岗位的重要。这在当时已是非常体面的职业了，至今家人仍引以为傲。

（二）

从照片上不难看出义和洋行的“高薪酬”，让他置办下如此兴盛的一大家子。由于信奉天主教一夫一妻的信条，这类家族和陆上三妻四妾家族的传统不同，照片上的关系很好辨认。孩子们按男左女右分立，老太爷的左手边一溜的七个儿子，从大到小排列（这家共有八子二女，老三木梯英年早逝，两女已出嫁），对应的家眷分立在老爷老太的右边，排列整齐一一对应。

背景是一栋外廊式建筑，建在离地面约50厘米的台基上。四面采用红砖砌成三大拱两小拱交替的外廊，拱线和腰线装饰造型简约却不失精细。这是对西方殖民地建筑创造性的模仿改良而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仔细辨认即可发现，这是一栋穿“洋衣”的高级木构“柴埕厝”。聪明的本地工匠在熟悉的“柴埕厝”建造基础上，将西方建筑的时尚表现在外观上，并注重运用砖的规整性砌出连续图案装饰细部，砖木的结合成就了这种“中西合璧”大厝。

唐庆平很认真地画了祖屋的平面图。这是一座中轴对称趋正方形朝东的大厝，长超16米，宽约14米，楼高8米，四坡顶。正面迎着泛船浦教堂的十字西出的部分，相距不到50米。大厝建在上世纪20年代，是依着当年李宏治主教建成的泛船浦木构教堂西边而建。大厝面东向教堂，而非福州建筑所喜爱的朝南向。这或许是唐天德的意

愿，可以每天祈祷，感恩心中的玛丽亚。后来老木构教堂被1933年拔地而起的哥特式教堂取代，大厝被遮障在教堂十字的阴影之中，不过，唐氏大厝于新民街一带依然有很高的知名度。

透过正中敞开的外廊，可见中间的“六离门”。这是中式“柴埕厝”特有矮门，虽然闽剧《六离门》对这种六离门赋予忠君的寓意，但实际上这是顺应福州气候的一种建筑结构，在南方很多地区都可以见到。半截的“六离门”有利于通风，上部的菱形花窗和人的视线等高，便于厅内的人观察外面的动静；而外边的人由于视线和光线的原因却看不清屋内。这扇“六离门”用材考究、工艺精细。庆平说对称两边门高大，门所依附的两大柱，可媲美福州传统“三落透后”大厝构件。

“六离门”后的“厅中”是家人活动、聚聊、议事的地方。厅与过厅两侧各设两卧房，过厅设上二楼的木梯。同样拱形外廊式的砖柱立于楼梯间和天井之中，安装着高大的拱形木门。穿过拱木门来到采光天井，天井两侧披榭是两大厨房兼餐厅，全家每天吃饭的人口多时超过30个，除了家人外，还有从孤儿院认领的孤儿4-5人，分桌用餐。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一家人依然聚族生活，买菜做饭是各房轮值，遇到大节日，老太爷亲自出马采买。碧回忆小时候陪爷爷唐木财去买菜，那个菜篮子巨大无比，需跟两个劳力去抬。

上二楼，三面宽约一米的“走马”（走廊）绕着天井。走马也是“柴埕厝”标配，可采光、可晾晒。正中连着一厅，左右各五卧，穿厅设一卧，除楼梯间外都是卧室。

这样看来也是够挤的，各房之间竟然相安无事。靠什么维系这多“房头”和谐的关系？一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确立的老太爷威严，再者是日诵的“不骂天不骂地”等宗教信条下的信徒隐忍，中西文化交织成泛船浦一带的人文精神。

（三）

照片上亮眼的要属唐家人的着装。老太爷穿

戴传统，长衫马褂瓜皮小帽；他的左边，一排男人着极富特色的黑衣，这叫“企领文装”，是介于汉装和中山装之间的过渡款；头戴的礼帽也有名堂，看似雷同，却有如黑帮教父的霍姆堡毡帽，还有平檐、鸭舌等东南亚风格帽饰。这该是当时当地最时尚的行头了。

老太太和右边的成年女子看似也身着一袭黑衣（或许色度极为饱和的深蓝、大红等色，黑白照片效果如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福州，服装五花八门，有西服、有粗布大衫、有旗袍、学生装，以及欧洲风格的裙子。而这群女子与同时代城里女人着装有明显差别。虽然她们都上了岸过起陆上人家的生活，发型也不像传统疍民女梳“田螺髻”，未婚女子留“齐眉”，不留侧眉。然而，照片中的女人一律着黑色的大腿“拢裤”，福州疍民妇女的着装特征。这是古老的裤型，在博物馆展厅，宋代贵妇黄昇墓出土丝绸服装就可见有开档、合档的大腿裤，近几年还成了流行的时尚款式。大腿裤即能摇曳生风，有裙裾之悠然，行动方便，尤其便于水上人居生活。一双双天足是她们有别于陆上女子小脚所特有的幸福。可见陆居疍民女仍保留具有优势的水上生活习惯。

照片前排一位约莫五岁小女孩，穿着面料考究目前看来依然时尚的韩版童装A裙。她是老三唐木梯的女儿，此时木梯已不在人世。唐木梯的孙子唐庆光说他的爷爷自幼聪明勇敢，考取了马尾港引水员，月薪13块大洋，在家族中收入最高。

闽江水道暗礁多，流网漫缠，又受潮汐影响，这片水域的水深、水流，外国轮船上的引水员是不熟悉的，本地的引水员对于闽江口航道来

说极为重要。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写到“闽江口挡着一座山……”“只能把船开到江口，换上当地的引水员把船引到宝塔锚地（文中注福州马尾）”。

然而，“引水员”也是极危险的工种。年轻的老三唐木梯虽身体健壮，机敏过人，却也逃不了英年早逝的命运。民国10年（1921），因所引航的轮船螺旋桨被流网缠绕，他潜水下去排除，再也没上来，年仅23岁。留下寡母和年幼的孤女，好在聚族生活，女儿成年招婿，延续了老三唐木梯的香火。

没了父亲，奶奶心疼小孙女，把她带在身边。她原本坐着，正要站起来的一瞬间，被奶奶拉住了，一只腿伸出了裙裾，这般可爱定格了近百年。

全家福合影背景的外廊上陈列着水仙花和金橘盆栽，按福州习俗应是春节，可以想象当年这家人是如何充满仪式感地穿上中西合璧的服饰，在中西合璧的建筑前，用洋人能“摄走魂魄”的照相机，拍下中国传统佳节全家福的珍贵瞬间。

（四）

老四唐木财是唐庆平和碧的爷爷，曾随父唐天德和二哥在义和洋行做“大车”，碧说她亲眼见过爷爷的外文证书，当时洋文的上岗证和这张全家福照片等资料一并压在五斗柜镜框后面。

兄弟俩还看过爷爷的洋文彩色圣经故事书，书上留着划痕笔迹；家里用过洋人离开时赠送的银烛台和餐具。直至解放初期，大厝阁楼上还藏

甲申、甲午海战及其历史教训

◇ 郭 震

发生于 1884 年的中法马江海战与发生于 1894 年的中日黄海与渤海海战，这两次海战均以战败告终。两次海战的前线指挥官、舰长、炮台长多为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的福州人。他们在海上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气贯长虹。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 33 位毕业生中，就有 8 位战死海疆。他们舍身为国、英勇献身的精神与清廷偏安一隅、昏聩无能、怯战求和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无意对两次海战作细节的描述，而着重于战争的背景，我参战官兵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感人事迹以及海战失败的原因做些探讨。同时，为长期以来对两战一线指挥官的不实苛责，作必要的澄清。

一、中法马江海战

1884 年法国侵略者借口在越南谅山受到清军攻击，造成死伤，向清廷索要 4000 万两白银赔款。若迟交一年涨十倍，即要 4 亿两白银。在赔款未到手之前，要占领中国一两个口岸作为抵押，即所谓“据地为质”。为此，法国派遣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侵犯福州，企图吞占马尾船厂为质地，作为在远东能源（煤炭）与修船基地。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向清廷宣战，于是爆发了马江海战。中法甲申战争，充分暴露了 17 世纪法国殖民主义的强盗逻辑与嚣张气焰。

清光绪十年甲申七月初三（1884.8.23），孤拔在攻击台湾失利后，率 6 艘战舰侵入福建马尾港，停泊于罗星塔附近，伺机攻击清军军舰。而此时朝廷却颁旨：“彼若不动，我亦不发”，



于是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张佩纶，未离任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镇闽将军穆图善等下令“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尤斩”。七月初三，孤拔指挥停泊在马江的“伏尔他”（Volta）等 10 艘舰艇向我“扬武”等 11 艘舰艇发动突然进攻。我福建水师仓惶应战，舰只还没来得及起锚，被

法舰的炮弹击沉两艘，重创多艘。后福建水师对法国军舰展开英勇还击，由于未作任何军事准备，加上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势，开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9舰被击毁，伏波、艺新两舰自沉），760名官兵殉国，几乎全军覆没。而法军仅5人死亡，15人受伤，军舰伤3艘，还摧毁了马尾造船厂和两岸炮台。

甲申中法马江海战，已过去一百三十多年了，福州马尾昭忠祠里躺着七百多位英勇战死的中国官兵遗骸，而法军阵亡不及十人，100：1之阵亡比，创造了我国历史上战争的惨败纪录。

海战过后，马江沿岸乡亲协同官兵打捞烈士遗体500多具，分九冢安葬。次年，张佩纶奏疏兴建昭忠祠。1920年，海军总长刘冠雄合九冢为一大坟，集烈士遗骨796具掩埋，墓前立一拱顶方亭，立碑题：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马江诸战士埋骨之处。

海战中，“建胜”舰管带林森林中弹阵亡后，“建胜”舰由在船督队的吕翰接管，他“短衣仗剑，冒烟指挥发炮攻敌。敌弹及公额，流血被面，裹首以帛，督战如故”，毅然指挥“建胜”努力击敌，看到一些胆小的水兵准备跳水逃跑，吕翰愤怒地拔出佩剑劈砍逃兵，最后“建胜”中弹沉没，这位刚烈的将领也身碎随船沉没，连遗体也漂失了，时年32岁。“福胜”舰上，大副翁守恭直接在炮位上指挥操炮，不幸中弹牺牲。管带叶琛面颊中弹，仍坚持指挥操炮，后被机关炮弹击中胸部而阵亡。

在昭忠祠中竖有一块“特建马江昭忠祠碑”，碑上刻有763名烈士的芳名。昭忠祠内中堂粟主（栗木做的神主碑）12块，写上“鏖战最力，特旨追赠”、“奋力致身，部议优恤”12人的名字。名列第三者为“参将銜都司吕翰”。与吕翰同期战死的还有：福星号管带陈英（3届），建胜号管带林森林（3届），福胜号管带叶深（2届），振威号管带许寿山（1届）。他们都是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

老福州人说起马江海战，都会大骂“两张”“两

何”，脱口而出顺口溜：“福州原无福，法人本无法。两何没奈何，两张没主张。”其“两何”指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两张”指巡抚张兆栋、钦差张佩纶。

“两张”之一的张佩纶、“两何”之一的何如璋在马江海战中究竟表现如何呢？

中法马江海战中闽海军战败，潘炳年正在北京，不顾与张佩纶同榜进士友谊，联络在京闽籍官员弹劾张、何二人。他们要为慈禧寻找替罪羊，利用激愤传闻，掩盖事情真相，罗织莫须有罪名，诬陷他们“玩寇弃师，僭军辱国，朋谋罔上，怯战潜逃”。随后，万培因又落井下石，诬告何如璋趁火打劫盗走船厂银子26万两，有人甚至信口雌黄，诬蔑何如璋投宿洋行，私通法国，是日本间谍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朝廷委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赴闽调查相关人事。其时，潘、万奏折已产生恶劣影响，慈禧朝廷对何、张已有了很深的偏见，社会舆论对何、张越来越不利。正如张佩纶所奏：“闽省京官及一二绅士，朋谋构陷，既请密查，又恐事涉虚诬，登之《申报》以肆丑诋，复扇惑劣绅公呈助焰，意在必成此狱。”

德高望重的左宗棠与杨昌濬等各方调查人员，深入马尾、福州实地详查数月，甄别、澄清了事实，一一举证，秉公推翻了潘、万奏中诬蔑不实之词。根据被告各人主管范围、应负职责及战役前后的具体表现，左宗棠、杨昌濬上奏朝廷，建议对张佩纶“既经革去三品卿衔，而人言不已，应请交部议处，以示薄惩”；对何如璋则“既经革职，可否邀恩免议”。

然而，左、杨奏折没能迎合旨意，慈禧一意孤行，终将张、何从重贬戍张家口军台治罪，达三年之久，制造了百年沉冤。张佩纶终被遣戍。

马江海战惨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廷的畏战与无能。

历史学家陈贞寿先生生前考证，马江海战中的张佩纶、何如璋都主张先发制人，长期以来民间及官方对他们的“丑化”，没有史料依据，他希望还张佩纶与何如璋真面目。“两张”之一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翰林学

士。1884年闽江口战云密布，清廷派钦差大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马江海战，中国第一支近代水师全军覆没。历史上，许多人一直认为是因张佩伦无能贻误战机，致使海战失败。

据陈贞寿先生考证，1884年7月，张佩伦一到福州，就积极备战，一方面调兵遣将，从南调回澎湖、兴化、泉州等5个营，从东和北调回了福宁、建邵、桂勇3个营，在福州到连江长门炮台沿岸布置了24个陆营共1万多人；另一方面，调回福建船政制造的部分兵船，连两艘在船坞维修的运输船也开出备战，还在沿江选募壮丁1840名。

张佩伦还提出“塞河”之策：在闽江口备下30艘轮船，装满石子，同时在附近岸上再备大量石块，待法舰入闽江口后，连船带石子沉入江中堵塞河道，令法舰无法出逃，以便我海军和陆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张佩伦准备好了轮船和石子，但清廷没有允许其用此策。

在北京等地的图书馆里，陈贞寿先生还找到了张佩伦多次请求先发制人的相关历史资料：

8月5日，张佩伦与时任船政大臣的何如璋去电请示清廷：法船再入数艘，我即塞河先发。8月6日，军机处寄何如璋电旨：现经美国调处，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

8月8日，张佩伦再电军机处：“互援是活着，先发是急着，舍两者布置更难。”8月11日，李鸿章电：“不如赔款以保和，一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

8月11日，张佩伦与何如璋再次去电请求朝廷：早定战计。但8月12日清廷仍寄希望美国调处。8月14日，清廷下旨“迅速整备一切事宜，听候谕旨”，仍不允张佩伦他们先发制人。8月19日，李鸿章再次急电张佩伦：“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仆不以决战为是。”一直到8月23日法舰突然向我开炮前，张佩伦都没有盼来开战谕旨。由此造成了福建水师临战被动全军覆没的严重后果。可以说，是清廷和战不定，贻误战机，致使马江海战战败，与张佩伦无关。

还有一些介绍马江海战的书籍说，马江战起，张佩伦怕死，逃到鼓山潘田。而实际上，在鼓山

至马尾之间有两处名“潘田”的地方，一处是在鼓山，一处是在马尾造船厂旁的马限山。海战中，张佩伦坚持在马限山统观全局，指挥作战。

“两何”之一何如璋，在许多介绍马江海战的书籍中也被认为是没有主张之人。何如璋，广东大埔人，同治进士，曾任驻日公使，马江海战时任船政大臣。他积极备战，还组织相关人士研究战法，多次上疏强调“彼以兵船衔尾相距，万一决裂，先发制人，后发即为人制”。但朝廷严谕：“无旨不得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他在家书中写道：“迭请南北洋拨船来援不应，迭请决战先发又不相应，惟饬静以待动，毋涉轻率，故只待株守以俟指挥而已。”可以说，马江海战之败，不能归罪于何如璋。

甲申马江海战惨败，只能怪罪于慈禧太后与李鸿章为首的统治集团腐败与无能。张佩伦是清末之“清流派”，因常上谏言而开罪于慈禧太后，在非常时间，张被派往人生地不熟的福州，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陷害。

晚年的郭柏苍在自己家门口目睹了中法马江海战的全过程，对这次惨痛的海战作了详尽的描述。以下是他记录这次海战的诗篇，诗注部分详细记录了战事经过，是一份珍贵的文史资料

其一：七月三日法夷攻马尾（闰五月二十一日，法艘至海口，大吏以和议未定，听渔户引港入，集马尾者十三艘。六月十七，法攻台湾之鸡笼山，报至，员弁以水涸，请以战期示敌，大吏不敢轻举。七月初一二日夜，台风淫潦潮头上拒，溪涨进之。初三午后，雷电交作，法乘潮开炮，片时，马尾历任船政所造十一艘荡然。初四至初八，法浮涨攻坏闽安等处炮台。初九，以潮退防胶滞，十三艘突出长门，镇闽穆将军图善击之，出泊海口之马祖，以闽无轮船游奕，白犬勇附之。奸民以瓜果牛羊接济。八月十三复犯鸡笼山，分艘攻沪尾。）乱离羁旅折双轮，辛苦艰难剩一身。千里风涛连白犬（法艘辄峨入集马尾，非巨涨将胶滞，不能出口），满天锋镝起潜鳞。和戎终古还多事（有旨奏和议者交刑部治罪），却敌如今有几人。亿万黄金铸流水（或曰马尾所造轮船，外国秘其术，故不坚韧），茫茫沧海欲扬尘（道

光辛丑七月，夷人陷厦门，当轴运石填塞濂浦，海船进港者多磕失，累经溪涨，石遁于海。今官又饬填濂浦梅花二港）。

其二：沁泉山馆晓起（时法艘在口）

东邻西舍阒无人（初三炮声震天，七城不闭廛市安然，初十以后城厢内外惧乱，避勇徙者过半），晓起又传风鹤惊。心力已衰只任运，琴书尚在敢言贫。园林渐觉忙中赘，僮仆偏于乱后亲。门外青山皆梦里，不知何处避烟尘。

其三：过洪塘江（时法艘在白犬）

烟波重访旧时游，笳角随人上小舟。江上愁心寄明月，雁边诗思入新秋。田庐经乱宁无恙，梨枣未完即隐忧。闲杀桥头数钓叟，不闻朝市老沧洲。

从郭柏苍的诗注中可搜寻到如下信息：1. 六月十七，法攻台湾之鸡笼山（基隆），台湾军务督办刘铭传率军抗击，炮台被击毁，后刘铭传率军与法军展开陆战，法军大败逃回舰上。2. 七月初三交战当日，法乘潮开炮，片时，马尾历任船政所造十一艘荡然。3. 初四至初八，法浮涨攻坏闽安等处炮台。（初四日，法舰又轰毁马尾船厂。）4. 初九，以潮退防胶滞，十三艘突出长门，镇闽穆将军图善击之，出泊海口之马祖。5. 二、三首诗描绘了海战后家乡福州惨淡境况。

值得提及的是我旗舰“扬武”号被敌水雷击伤，但以尾炮击中法国旗舰，毙、伤法水兵多人。运输舰“福星号”亦冲入敌阵与法舰激战，后中弹爆炸，舰上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面对开战首日之失利，我官兵并未放弃斗争，当法“十三艘突出长门，镇闽穆将军图善击之”。据《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述曰：“当孤拔舰队离开马江时，先启锚，后奏凯歌，复行开炮示威，其帅孤拔扬扬得意立望台顶，以千里镜探视两岸，陆营管带杨金宝料敌舰正离马江，即时下令，拔去驻地所有旗帜，并移营深林中，设下伏兵，使不及防，同时复下令整齐队伍，实弹荷枪，伏于岸旁，已杂其中指挥士兵，瞬间，敌舰果至，彼即下令，乘其不备，以数百杆洋枪队同时猛力攻击敌舰，只见望台顶孤拔应弹身亡，敌舰闻耗不及还炮，

旋即下旗举哀。”但根据郭柏苍的记述：“八月十三复犯鸡笼山，分艘攻沪尾。”孤拔率领的船队，离开马尾后重又驶抵台湾骚扰基隆港与淡水之沪尾港，以后又北上攻击镇海，由此分析，长门水兵以洋枪隔岸攻击船上之指挥官，最多可能致伤，否则他不可能继续率领船队作战。在次年3月1日及以后的数天里，发生了著名的镇海保卫战，孤拔于3月28日退到澎湖并占据。由于在基隆进退两难，孤拔最后因为疾病死在澎湖，结束了他的一生。

纵观整个中法战争的全过程，法海陆两军虽于多数战役占上风，但均无法取得底定全局的战略大胜：法国远东舰队虽于海战赢得全胜，并一度攻占基隆，却因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一役受挫及疫病流行，无法达成拿下台湾全岛的战略目标；而清军虽于初期陆海皆遭惨败，导致由恭亲王奕訢领班的军机处被全面撤换（甲申易枢），但后期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且有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导致费里政权垮台。整个战役可说是打了平手，就是马江一战输得太惨。

甲申马江海战失利的教训，除了清王朝之统治者畏首畏尾，不敢与敌交锋之外，缺乏起码的海权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任由外国船队长驱直入于内港，并缺乏对其戒备，在其突然袭击下便造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惨败。

二、甲午中日海战

马江海战十年之后，又爆发了中日甲午海战。

日本凯觐中国领土已久。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时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将对外侵略扩张作为日本国策。

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1890年，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

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战前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

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北洋水师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人。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1. 丰岛海战

1894年7月，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保存嫡系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到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才应光绪帝的要求，开始派兵增援朝鲜。1894年7月25日农历六月二十一，“威远”护卫“爱仁”、“飞鲸”两轮自牙山返航。二十三日晨，“济远”、“广乙”两舰也自牙山回航，接应正向牙山驶来的“高升”“操江”，当驶至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时，突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巡洋舰“吉野”（旗舰）和“浪速”“秋津洲”的截击。战斗约一小时，“济远”“广乙”负伤败退。“广乙”逃至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焚毁。“济远”被“吉野”紧追，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用尾炮将其击伤。此时，“操江”“高升”驶至。“秋津洲”逼降“操江”，“高升”被“浪速”所截，船上官兵宁死不降。“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竟下令将“高升”击沉，清军950人除200余人生还外，余均殉难。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宣战，甲午战争开始。

2. 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发生于1894年9月17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

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海战。这是甲午战争中继丰岛海战后第二次海战。9月15日上午，北洋水师护送4000余名入朝援军到朝鲜。返航后在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遭遇日军阻截，战斗由此爆发。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投入战斗军舰则有12艘，包括其全都精华。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叻、赤城、西京丸号诸舰，但北洋舰队中扬威、超勇二舰亦受重创。北洋舰队虽腹背受敌，形势不利，但广大官兵毫不畏缩气馁，反而“愈战愈奋，始终不懈”。提督丁汝昌身受重伤，不下火线，置个人生命安危于不顾，裹伤后，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激励将士，同心效命”。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于丁汝昌负伤后，“代为督战，指挥进退”，尤为出力。广大士兵顽强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更为感人。就连亲身参加海战的定远副管驾英人泰莱也承认：“众士兵均矜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当予巡视时，一兵负重伤，同侣嘱其入内休养；及予重至此炮座，见彼虽已残废，仍裹创工作如常。”“超勇、扬威虽被日本第一游击队击中起火，但并未停止战斗。官兵们一面救火，一面抗击。”特别是超勇舰体虽已左右倾斜，然犹以前部炮火发射不停。当比睿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抄近路与本队会合时，适与超勇相遇。超勇在烈焰升腾中也不肯放过敌舰。一面救火，一面向比睿发炮轰击，表现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之后，敌舰本队绕至北洋舰队阵后，聚攻超勇。超勇孤立无援，2时23分，终于在敌舰炮火丛集下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不就，从容死难，舰上士兵也大部壮烈牺牲。

致远号官兵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尤为可歌可泣。在管带邓世昌指挥下，致远号纵横海上，与敌奋战，中弹累累，受伤歛侧。在激烈的战斗中，炮弹垂尽。这时，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气愤地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企图冲击敌阵发动冲角战术及鱼雷攻击，保全军之胜利。陈金揆深为感奋，遂鼓快车向吉野猛力冲突。日本官兵见状大

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3时30分，以右舷倾斜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邓世昌坠海后，随从刘忠跳入海中以救生圈援救，使之浮出水面。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邓世昌平时蓄一爱犬，游至身边，以口衔世昌臂，使之不沉。世昌挥之不去，并以口衔其发辫。邓世昌抱与全舰将士同生死、共存亡的决心捺犬首于水，自己也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牺牲时年仅四十五岁。

致远沉落后，在致远附近的济远见状立即逃离战场，途中误撞扬威。“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水渐汨汨而入”。不久在东经123度40分9秒，北纬39度39分3秒的黄海海面上沉没。管带林履中愤而蹈海死。舰上官兵除被左一鱼雷艇救出六十五人外，均壮烈牺牲。海战后不久，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着即行正法。”9月29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

广甲与济远编为一队，广甲管带吴敬荣见济远撤退，以为有例可援，随之逃跑。因惧敌舰追及，慌不择路，逃至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吴敬荣率众纵火弃舰，登岸逃命。海战后第二天，北洋舰队派济远拟将广甲拖回港内，猛拖不起，此时数艘日舰至，济远急退回大连湾，广甲被日舰发炮击碎。

日本第一游击队见济远、广甲撤走，曾奋力追击。但因相距太远，追之不及，遂折回集中火力围攻位于北洋舰队右翼阵脚之经远，“先以鱼雷，继以丛弹”，经远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指挥全舰，奋勇抗御，“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以一抵四，拒战良久。突然，忽来敌炮，击中经远。林永升中炮，头裂牺牲。经远“火势愈烈，烟焰焦天，俄尔舰体逐渐向左舷倾斜”。不久，“左舷舰首向水中沉下”。在舰体已下沉的危急关头，经远官兵仍继续沉着应战，一直坚持到最后，在庄河黑岛南老人石海礁附近沉没。全舰除16人获救外，近

200人殉国。

由于北洋舰队先后失去6舰，因而在最后阶段的海战战场上，坚持战斗的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4舰。日本则尚有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9舰。双方军舰数量对比为4比9；吨数对比为19870吨比33834吨。日本舰队力量超过北洋舰队一倍以上。北洋舰队处境十分困难。但是，定远、镇远等4舰全体爱国官兵，面对优势敌人，毫无惧色。他们坚持战斗，力挽危局，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定远、镇远虽被敌舰5艘团团包围，并无惧色，它们“誓死抵御，不稍退避”。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表现尤为出色，“作战果敢，指挥灵活。行船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镇远管带林泰曾、大副杨用霖指挥镇远舰“奋击突进，操纵自在”，始终与定远保持着互相依恃的犄角并列阵形，与敌军5舰周旋，在林泰曾、杨用霖指挥下，镇远“开炮极为灵捷，标下各弁兵亦皆恪遵号令，虽日弹所至，火势东奔西窜，而施救得力，一一熄灭”。在艰苦的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据在镇远参加战斗的洋员美国人马吉芬记载：镇远“十二吋巨炮炮手某，正于瞄准之际，忽来敌弹一发，炮手头颅遂为之掠夺爆碎，头骨片片飞扬，波及附近炮员，而（其他）炮手等毫无惊惧，即将炮手尸体移开，另以一人处补照准，赓续射击。镇远炮术长幼弟某，来舰访兄，因战机迫切，未即离舰，遂应兄劝，配备于露炮塔上服务，热心勇猛，毫无惧色。战斗中，炮术长身负重伤，扶入舱中，弟向乃兄略事安慰，仍归原处服务。是役，该炮塔人员，除乃弟外，无不伤亡”。就这样，定远、镇远在敌强我弱的极困难条件下，继续“与倭各舰相搏，历一时许，巨炮均经受伤。定远只有三炮，镇远只有两炮，尚能施放”。同时“火焚数次”，但广大爱国官兵一面救火，一面抵敌，始终不懈。

北洋舰队方面，此时“靖远、来远修竣归队，平远、广丙、鱼雷各艇亦俱折回”。靖远号管带叶祖珪，帮带刘冠雄知定远桅楼被毁，无从指挥，遂主动代替旗规定远升旗集队。诸舰毕集，军威



重振。集合后定、镇、靖、来、平、丙 6 舰相距各八九米，鱼贯东行，尾追敌舰十余里，准备与敌再战。但时已日夕，暮色苍茫。日本舰队惧怕定远、镇远诸舰会合鱼雷艇进行袭击，不敢再战。开足马力“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瞬息已远。北洋舰队也收队驶回旅顺。至此，历时 5 小时的激烈海战宣告结束。

黄海海战历时 5 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 5 艘军舰，来远受重伤，死伤官兵约 800 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 5 舰受重伤，伤亡 239 人。

黄海海战以后，北洋水师退回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3. 威海卫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战。日本大本营对山东半岛的作战部署为“海陆夹击”北洋舰队。李鸿章在建完各炮台后，即调派绥、巩军各 4 营分别驻守北帮炮台、南帮炮台。同时在刘公岛上驻扎北洋护军，并在海港东西两口布设防材和敷设水雷。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 26 艘。

1895 年 1 月 20 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

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楨中将的第六师团，共 25000 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同时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登州实行炮击。山东巡抚李秉衡由于弄不清楚日军究竟要在何处登陆，只好分兵把口，“时刻严防”。23 日，日军在荣成全部登陆完毕。30 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 6 营 3000 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顽强抵抗，最后被歼灭。日军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被清军炮弹打死，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唯一阵亡的将军，左翼支队的 4 个中队日军被迫退至冯家窝。由于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 月 3 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数被日本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 日凌晨，旗舰定远舰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10 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自杀。11 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炳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炳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最终自杀。12 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

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璧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895年3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延续9个月的惨烈海战结束。海战中战死与杀身取义的将领有：

丁汝昌，清朝晚期将领，官至北洋海军提督。光绪七年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光绪二十一年，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最后在弹尽粮绝，援军来援的希望破灭之后，拒绝了伊东佑亨的劝降，服鸦片自尽。

邓世昌，清末北洋水师将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谥壮节公，追封太子少保銜。光绪帝挽联写道：“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刘步蟾，北洋水师右翼总兵。黄海战役中丁汝昌受伤，他代为督战指挥，鏖战三时许，多次击中敌舰。次年，在威海卫海战中英勇抗敌，以身殉国。

林永升，北洋水师成军后升任左翼左营副将，后迁至总兵。在甲午海战中阵亡后，清廷以其在海战中“争先猛进，死事最烈”，照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敌众我寡的危难之际，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督率全舰官兵勇猛抗敌，直至经远舰沉没于黑岛南海域老人石附近，林永升与全舰20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1994年春，黑岛镇人民政府集资，在鳌头山前坡树立爱国将领林永升塑像，为后人瞻仰。

左宝贵，回族“甲午三英”之一。甲午海战中，身受重伤仍坚持督战，燃放大炮，后中炮牺牲，牺牲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令人敬佩，让人感动的流泪。

沈寿昌，1894年7月下旬，随济远舰护送受雇英轮高升号运兵赴朝鲜，在丰岛海面遭日本吉野号等舰突然袭击。当管带方伯谦临阵令济远舰

逃窜时，即奋不顾身，指挥属下竭力还击，炮伤吉野号。激战中以身殉国，年仅32岁。

柯建章，1894年7月，“济远”完成任务返航，行至丰岛附近海面时，遭到日本“吉野”等3艘军舰的突然袭击。“济远”无可回避，亦开炮还击。大副沈寿昌奋勇督战，不幸头部中弹，当即牺牲。柯建章见此情形，继续督炮击敌。鏖战中，亦不幸中弹，洞胸阵亡。沈寿昌、柯建章等的誓死拼搏，前仆后继，赢得了“济远能战”的赞誉。

林泰曾，镇远舰管带，林则徐侄孙，1888年任北洋水师左翼总兵。黄海海战后，镇远号掩护船队断后，入港时触礁受损，林泰曾自认失职后自杀。

上述诸多将领英勇战死外，尚有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被阵前斩首。黄海战后，朝廷上下问责丁汝昌提督之声纷纷攘攘。丁汝昌原是太平天国中一将领，后归顺淮军，因战斗英勇，屡建战功，被李鸿章收为心腹，并被委为北洋水师统领。当时，人们早有诟病李用人不当，叫一个不懂海军技术的人提督海军。当时清流刘体仁曾曰：“丁汝昌夙将骑兵，以统海师，朝廷用人，自为失当。汝昌屡受督责，欲战，自知不敌，惟求一死塞责。大东沟之役，仓卒应敌，不知学理，立定远望台之上，致被震仆；反谓日炮击毁，倾覆受伤。朝臣不知机械之学，无从指驳。外人见之，无不匿笑。”而李鸿章又不愿放弃丁汝昌，而把海军指挥权交给他有所戒备的闽籍将领。这就需要找个替罪羊，于是便急匆匆以方临阵脱逃，而影响整个战役失败为借口，唆使闽籍水师副帅刘步蟾监斩了方伯谦。而出师朝鲜的统帅叶志超，弃守平壤，临阵脱逃，因是淮军出身，就不加追究。以此拙劣的手段，保一些人，杀另一些人，正是当时统治集团黑暗与腐朽之典型。也是“双甲海战”惨败的根本原因。两次海战恰逢慈禧太后过五十与六十大寿。大规模的寿庆活动挪用了海军经费，使北洋舰队长年得不到更新与扩大规模，从光绪初年军力远超日本国，至临战时，海军的吨位与战力远逊于日本。所以两次海战都吃了败仗，也在意料之中了。

海事维艰 臣心如铁

◇林丽钦

中国直到晚清时期海洋防御问题才为朝廷所重视。权倾朝野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晚清海防中的分量自不待言，而在1875年被任命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楨以及作为洋务运动缩影的马尾船政，我们也不应该遗忘。《从船政到南北洋——沈葆楨李鸿章通信与近代海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一书，将134封沈葆楨与李鸿章在1873年到1879年间的私人通信加以整合考订，梳理出时间先后和往来关联。沿着每一封信的肌理脉络以及附后重大历史时刻核心环节的解读，一幅近代海防建设图缓缓摊开。

从1873年船政建设即将告成到1879年沈葆楨病逝两江总督任上，这七年间沈、李二人通信频繁。通信内容涉及海防建设、外交折冲等核心事件以及私人交谊。这134封隔空互致的私语，也将沈、李二人一以贯之的人格气度、政治坚持更加立体地铺展开来，让我们看到持久配合之外的持久“对峙”。在海防建设中是否应购建铁甲舰的问题上两人大异其趣，各持己见。1874年台湾事件后，沈葆楨迫切希望中国可以购建铁甲舰。而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倾向购买蚊子船，对铁甲舰的购建则以经费不足、“人才难觅”、“铁船顾虑无用”等原因多方推诿。沈葆楨对李鸿章所称的铁甲舰无用论进行批驳，认为这些港口防御武器虽然有用，但“海上防不胜防”，不可能沿海各港口遍布水雷蚊子船，一旦“仓卒事起”，“惟立外海水师，则南北气脉可以联络”，坚信要有能够在外海决战的水师，方能南北联络作战。对于海防经费欠缺的困境，沈葆楨乐观地相信“安见一篑非所以为山”，集腋成裘终可成事。至于非要等有才望并佳的人出现才能去大力

建设海军的观点，他认为“才无可试，望则老矣，自强在何日乎”，并提醒李鸿章购买船舰不能贪小便宜，“天下明便宜者，必吃暗亏”。沈、李二人为此事在来往信件中展开了长时间交锋犀利的反复辩论。

1879年11月7日，沈葆楨在病逝前的一个多月，给李鸿章寄出了（目前有存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无不遗憾地表示：“闻前次在闽交割，故令管驾在罗星塔守候。比获咨示，飭令径驶津沽。”提及曾委托李鸿章代购几艘蚊子船之事。沈葆楨预先为四艘船做了命名并派遣军官准备在马尾替南洋接收该四舰。然而，这几艘舰船并没有在福建停留，而是奉命径直前往天津。1879年11月30日，李鸿章在致沈葆楨的信中解释其已将新购的四艘蚊子船留在北洋使用，而将之前购买的四艘旧的蚊子船调给南洋。并提到已经将原本购买铁甲舰的款项改为购买两艘撞击巡洋舰。但是这封信沈葆楨再也无法在喘息乍定的间隙提笔回复，因为当年的12月18日，他就因为病情恶化，带着对海防事业的无尽牵挂，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去世，终年59岁。

沈葆楨生前对自己的健康未尝不忧急伤恻。自1876年始，沈葆楨就频频在信中向李鸿章提及自己的健康问题，到1877年已经“不能伏枕者兼旬”，甚至因为病痛折磨向清廷提出开缺休假并辞去职务，到1878年甚至严重到坐卧“尚须人扶掖”。虽早知寿数无多，然国家内乱外患不能退而作壁上观。面临清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经费保障不力的尴尬处境，沈葆楨曾经对李鸿章谈及船政在当时是“最窘”“最冷”的部门之一。但也是沈葆楨在“最窘”“最冷”的部门里受命忘“难”，建立起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独创船政、南洋大舰队，开办新西式学堂，培养了中国最早的欧洲留学生。他为船政不致中废吃苦犯难的努力贯穿始终，“安知一篑非为以山”的坚毅乐观贯穿始终。

尽管他们都不能阻止沾满硝烟的战舰和帝国巨轮的最终沉没，但拨开那段风烟沧桑的历史，我们依然在往来互致的文字中看到政治谋算之外的风骨底线、利益权衡之上的使命担当。

冯梦龙笔下的 福州古代“七夕”故事

◇王 凌

农历七月七日，俗称七夕，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聚的时间。传说织女违背玉帝旨意，私自下凡与牛郎结婚，这是没有法定手续的婚姻，故他们真正可称为中国古代的“情人”。据冯梦龙在《情史》中记载，古代福州人崇尚“七夕”，一些爱情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天，可以说为中国古代人认定“七夕”的“情人”意蕴提供了证据。在《情史》中记录了古代恋人在七夕后分别时写的一首诗，诗中的确有“情人”二字出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辰更何时。”

下面介绍两则有关故事，以飨读者。

湘潭女子王玉英与福清秀才韩庆云

冯梦龙在《情史》“情感类”中记载，宋德祐间，湘潭人王将军“为闽守”，驻兵于福清与长乐交界的“蓝田石尤岭”。时值元兵侵入长乐，王将军“将兵御胡元战死”，他的女儿王玉英“不肯辱，与其家死岭下”。被人草草掩埋，不久尸体竟然裸露在山坡上。

此时，“福清茂材韩生庆云，授徒于长乐之蓝田石尤岭间，见岭下遗骸，归具畚鍤，自为瘞埋”。可见，韩庆云秀才是个善良的书生。“是夜”，有人“剥啄篱外”（按，韩庆云住的是乡村带有篱笆小围墙的土屋）。韩庆云开门一看，有个自称“王玉英”的“端丽女子”，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可怜身世和此次夜访的目的：“岁久，骸骨偶出，蒙公覆掩，恩最深重，来相报耳。”并且郑重声明：“妾非人，虽不可谓非人，理有冥合，君其勿疑。”大胆且富有同情心的韩庆云当夜与王玉英交合，“而亡何，子生，孕以七月七日”。正是七月七日这一天，播下了他们二人爱情的种子。

王玉英生子后，就已告诫韩庆云的母亲：“儿受阳气尚浅，未可令人遽见。”但其母急于抱孙而归，突然登楼，王玉英只好“抱子从窗牖逸去，噉儿果尚弃在地，始犹谓是莲子，察之乃蜂房也”。

离开韩家的王玉英抱着儿子“归湘潭”，因无人接养，只好“弃之河旁”，留下衣带，上写“十八年后当归来”。此弃儿被“富而无子”的湘潭黄公“拾之”。这个儿子长大后，“清癯敏慧异常儿，名曰鹤龄”。后来，黄公自己又生了两个儿子，“曰鹤算、二龄”。他的三个儿子“共习制举之业，颇有声。已而，二弟皆授室，独鹤龄泥衣带中语，未决”。果然在黄鹤龄18岁时，韩庆云受王玉英指引，到了湖南湘潭，认回了亲生儿子。这说明，王玉英认为自己无法陪伴韩庆云，也要让他有亲生儿子养老，感情是真挚的。

在这18年间，王玉英仍然回来看韩庆云，“相期唯一岁一来，来必七月七夕”。“七夕”真正成了他们的情人节。“女能诗，长篇短语，笔落数千言，皆臻理致。”如《忆生》诗：“洞里仙人路不遥，洞庭烟雨尽潇潇。莫教吹笛城头阁，尚有销魂乌鹊桥。”勇敢、善良、贫穷的福清秀才韩庆云遇到了这样的情人，无论是鬼是人、是祸是福，都能坦然面对、不离不弃，忠贞不二，也应当算是有情人了。

这则奇异的传说“事见《耳谈》”，经冯梦龙在《情史》中转载后流传至今。对于这种人鬼相恋的传说，冯梦龙在《情史》中作了这样的点评：“古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盖思生于情，而鬼神亦情所结也。使鬼神而无情，则亦魂升而魄降已矣，安所恋恋而犹留鬼神之名耶！鬼有人情，神有鬼情。幽明相入，如水融水。城之颓也，字之留也，亦鬼神所以效情之灵也。噫！鬼神可以情感，而况于人乎！”

福州孙昌裔七夕暴卒遇神妃

在《耳谈》一书中还记载了福州一则关于七夕的故事，也是经冯梦龙《情史》转录、流传至今。

“福州孙昌裔，字子庆，为进士承谟子。寓京，在庄太史梅谷公宅，与太史子乔申同授经于黄冈曹孝廉孟彦”。

“昌裔通古文辞，万历癸未（按，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时冯梦龙9岁）七月七日，感牛女之事，因戏为文通于牛女。是夜，忽暴卒。第心坎微热，莫知其故。越三日，忽苏。”他告诉围坐旁边、以为他已去世的父亲及师友，自己“顷为神妃召去”，然后讲了一段在天上会见神女的经历，也算是人间书生在天宫演出的一场“情人”相会。

冯梦龙在《情史》中对此故事加以点评。一方面，他认为这则传闻有出处：“此出自曹孟彦口述，目击其事，当不谬”；一方面又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若真是神妃，则是夕正七夕，牛郎方在，何暇他及。”冯梦龙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使作为情人，不具有合法的婚姻手续，但也必须感情专一。所以神妃七夕不与牛郎聚会，却移情别恋，是有悖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的。冯梦龙把邂逅的“一夜情”排斥在“七夕”的正宗传说之外，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情人观”。

糖、兵与海船： 马可·波罗的“福州记忆”

◇刘洪哲

宋元时代，经济繁荣，中外交流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家乡远赴中国，在中国游历17年，回国后，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经记录整理后以《马可·波罗游记》为名出版。《马可·波罗游记》开创性地向西方介绍了东方中国这片神秘而富饶的土地，引起了轰动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记录福州。马可·波罗敏锐地察觉到福州是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的政治和军事重地，同时又以通江达海的优势深度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中。马可·波罗观察甚微，对福州的物美价廉和美丽宜居赞不绝口。马可·波罗的“福州记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见证，也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理解福州国际地位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史料。

马可·波罗其人与其书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上都。他深受元世祖忽必烈器重，与忽必烈建立了跨国友谊。马可·波罗在中国17年间，遍访中国的大好河山，也见证了宋元两朝之更替。回到威尼斯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他在监狱里遇到了同样落难的作家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两人在监狱里碰



马可波罗

撞出了思想的火花，于是由马可·波罗口述，回忆在东方的旅行经历，经鲁斯蒂谦记录整理，在他们出狱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有“世界一大奇书”之称，是人类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它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特别是其中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

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哥伦布从小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在书上做了264处共475行边注。他在1492年寻找新大陆的首航之行，随身带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达·伽马率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之行，也是在出发之前仔细阅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对划时代的新航路开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带来的轰动效应，人们对它的研究也逐渐重视，特别是《马可·波罗游记》在社会上流行多个语种的版本，每个版本的内容又不尽相同，究竟以哪个版本为准？一直困扰着读者和相关的研究者。关于《马可·波罗游记》流行的版本，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法国地理学会版，或称老法文版；二是改定的五种法文写本；三是庇庇诺（Pipino）拉丁文译本；四是赖麦锡（G. B. Ramusio）意大利文版；五是“Z写本”（Codex Z.）。因《马可·波罗游记》口述原文记录已失，上述几种流行版本均有其优势和特点，法国地理学会版被认为最接近马可·波罗在狱中的口述原文；法文改定本和拉丁文译本则在马可·波罗出狱多年后得到其审阅；其他两版则能综合各版本之优势而去其不足。至于此5种之外的版本及各种翻译文本，则数不胜数。

外文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已经如此复杂，将其翻译成中文则是一件更为复杂的问题。版本的选择就是一大难题，由于《马可·波罗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项工程量巨大的任务。关于中文的各种译本，多数认为从版本选择、考证深度等方面来看，数冯承钧和张星烺所译版本为好，其中冯承钧所译版本（命名为《马可波罗行纪》）在首次出版后曾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多次重印出版。因冯承钧所译版本能举相关

版本的不同之处予以对照，本文所用《马可·波罗游记》内容以冯承钧所译版本为主，并辅以其他版本。

物产丰隆的华丽之城

在福州，马可·波罗首先发现的是福州工商业的发达。“此城为工商辐辏之所”。其中标志性的产业是制糖业，“此城制糖甚多”。对于福州及周边的制糖业，马可·波罗两次提及，除了此处关于福州城的制糖，还提到离福州城十五哩有一个叫“Vuguen”的地方制糖业发达，当地制作的糖作为贡品直接运往首都北京皇宫，可见其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马可·波罗饶有趣味地指出，“Vuguen”的居民以前只会煮浆不会制糖，在元朝统一以后，元世祖忽必烈特意差遣居留中国的埃及人到当地传授制糖术，此后“Vuguen”制糖业逐渐兴隆。

长期以来，关于“Vuguen”究竟为何处未有定论，相关研究有尤溪、永春、南平、永安等不同的说法。1980年南京大学王颀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中指出，“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15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文中引用明代《闽都记》为证：“甘蔗洲在于五都，宋时有砦，设巡检司，置戍焉。今革。环洲以居千家，种树艺圃，地产橄榄。向时种甘蔗为糖，故名其洲。”此观点国内马可·波罗研究方面专家杨志玖在1996年《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一文中认为“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无论从距离福州的里程还是闽侯甘蔗地区的特点来说，闽侯均很大程度上符合“Vuguen”之说。成书于南宋的《三山志》明确指出：“糖，取竹蔗捣蒸，侯官甘蔗洲最盛。”

在马可·波罗的记忆里，福州除了制糖业发达，还盛产水果、樟脑、生丝等产品，甚至“凡

生活必需之物皆饶”，更重要的是物价甚低。与此同时，城内令人赏心悦目的园林甚多，“此城美丽，布置极佳”。在马可·波罗笔下，福州集美丽、富饶、宜居于一体，简直是人间天堂。事实是否如此呢？据《三山志》记载，宋代福州产果品35种，蔬菜37种，其中如荔枝和柑橘就分别有28种和23种亚种，此外还产鱼类35种、软体动物36种，可见当时福州地区物产之盛。而据《八闽通志》记载，元代福州路要向朝廷进贡锦荔枝20万颗、锦圆眼20万颗，此外还有柑、橙等进贡朝廷，可见元代福州水果无论产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都是一流的。

城市建设方面，随着宋代福州经济的大发展，主政者十分重视城市建设工作，实施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举措。知州张伯玉决定在福州遍植榕树，福州“榕城”之名开始远扬。蔡襄、赵汝愚相继疏浚东湖和西湖，内河水系治理卓有成效，高大上的西湖公园也是在宋代从原来闽王的私家园林转变为公共园林。宋元时期福州经济繁荣，城市建设成效显著，马可·波罗对于福州的描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贸易枢纽与军事重镇

丰富的物产除了满足本地人和皇宫的需求外，随着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寻找其他地区的市场，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接踵而至。在马可·波罗看来，福州对外贸易有着天然的优势。“有一大河宽一哩，穿行此城”，“此城建造不少船舶，以供航行此河之用”。更重要的是，此河连通大海，海船可以直接从海中沿此河而至福州城。马可·波罗观察到，河两岸都建有高大豪华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福州的各种货品，特别是糖。而很多印度海船则装载着大量当地的珍珠、宝石直达福州进行贸易，双方交易量巨大。福州当地也有商人远赴印度进行贸易。

在这里，马可·波罗明确指出，福州与刺桐（即泉州）近，很多外国船只到达刺桐港后，又运载商品“上溯前述之大河而至福州城”。随



马可波罗塑像

后，他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刺桐中外贸易之盛景：“此城为世界第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几难信有其事。”宋元时期的泉州是中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号称东方第一大港，而中唐以来福州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有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的说法。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既确认了泉州在中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也忠实地记录了福州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外国的商船是在泉州与福州之间相互穿梭的。从研究福建海上丝绸之路角度看，这一点是需要值得注意的。

在福州，除了经济贸易的繁荣，马可·波罗感受到了强烈的军事气息，因为他发现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派驻重兵驻扎福州：“军队戍此者甚众，盖其境内城村屡有叛变之事，故大汗以数军戍之，由是若有叛变发生，福州之戍军立取叛城毁之。”马可·波罗受到忽必烈厚待，短短几句，却触及了那段波澜壮阔的抗元往事。

南宋末年，北方的蒙古部落异军突起，先是建立大蒙古国，随后迅速扩张，先后灭金、西夏、大理等国，并横扫中亚、东欧，深入欧洲腹地。其对南宋也是步步紧逼，于1276年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在这危急之时，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以福州为行都，改元景炎。虽然形势仍然严峻，但整个福建地区的抗元形势为之一振。益王政权在福建新招募了大量兵员，而福建民间武装也是纷纷响应。即使在元军占领福建全境之后，福建民间抗元斗争仍然此起彼伏，大规模的反抗持续近20年之久。

正是由于福建反元斗争的高涨，元朝为巩固政权，不得不派驻重兵驻扎福建。福州在宋代是福建路所在地，是福建的政治军事中心，又一度是南宋的行都所在，元朝驻扎军队尤多。《万历福州府志》载：元“初以兵千人增戍福州，继以江淮万户府来镇，后又置亳州翼万户府，又设福新万户府，岁遣万户一人。又有巡军弓手，并隶四巡检司。”马可·波罗看到了现象，但是对于宋元战争的历史和残酷性，恐怕只有中国人内心最清楚。

“福州国”与福州城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不仅有福州城，还有福州国。关于福州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从行在国最后之信州（cinguy）出发，则入福州（fuguy）国境。”福州史上并无福州国之称呼，此处福州国应为福建省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去深入探究宋末元初福州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再结合中西文化差异，马可·波罗的表述其实是相当合理的。

首先从马可·波罗自身文化语境来说，他出身于威尼斯商人家庭，威尼斯在当时既是欧洲发达的港口城市，也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首都。当时欧洲很多国家未完成统一，城市国家很多，而意大利尤甚，城市国家由中心城市命名十分普遍。即使在现代，西方仍然习惯在国际政治新闻中以首都代指国家，如“华盛顿方面”通指美国政府，“莫斯科方面”通指俄罗斯政府。应该说，西方以中心城市代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是有历史文

化背景的。

再看福建当时的行政机构设置。马可·波罗在中国时期经历了宋元朝代更替，宋代中央政府在福建设立了福建路，路的范围相当于后来的省，福建路辖6个州、2个军——即福州、建州、泉州、南剑州、汀州、漳州、邵武军、兴化军，路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安抚使。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路安抚使长期由福州知州兼任，这一方面是在宋代路这一级的行政机构体制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则说明福州在福建路的中心地位。元代虽然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行省制度，但在初期行省设置一度十分混乱。中央政府在福州设立过单独的福州行省（后撤销），福州也做过福建行省的省治，随后中央政府干脆将福建行省撤销并入江浙行省，到元朝末期又复设福建行省，仍治福州。事实上，福建的名称即取自福州与建州。作为来自威尼斯国威尼斯市的马可·波罗，对于其笔下的福州国与福州城，我们需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予以理解和尊重。

当然，马可·波罗笔下的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因为他明确指出，南方九国也只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代表的仍是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综合其关于福州国的其他记载，可以确定福州国实际上指的就是福建省的范围，写成国更多是文化习惯所然。但是福州国这一称呼却实实在在地写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深入马可·波罗的记忆里，这对于研究福州历史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马可·波罗显然是厚爱福州的，他将“美丽”“富饶”这些赞美之词毫不吝惜地给予了福州，甚至在他离开中国多年以后，在口述历史中仍把整个福建以福州国命名之。他以全球视野发现了福州在中外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对福州沿江向海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700多年前，一个威尼斯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今天，“东方威尼斯”福州展露新颜，沿江向海，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乘主办世界遗产大会东风，再次登上全球舞台，必将成为闪耀在“一带一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福州琅岐说董家

◇董山静

在福州，每一种传奇风物都浸染了江涛与海浪的气息，马尾琅岐岛参与海上福州的发展，见证了闽人与海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脉相连，族群的构成与江海也密不可分。曾听长辈们说过：“一座宗祠一条根脉，一个姓氏一段渊源。了解家族往事，探寻家族传承就从宗祠开始。”万流归宗，饮水思源。

琅岐，古称琅琦、嘉登岛。琦，美玉之意，美丽的琅岐岛就像一块玲珑的美玉镶嵌在闽江入海口。民间有则神话传说，说的是八仙过海，驾云途经闽江口，俯览到这里的山山水水，不由地羡慕：“此处又一蓬莱仙境！”从云端降落岛上，饮酒赋诗，乐而忘返。因此，常有瑞云缠绕、烟岚飘渺的琅岐白云山上还留有铁拐李脚印的“八仙岩”遗迹。

历史悠久的琅岐岛，全岛总面积92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本岛的面积。这里人文荟萃，早在一千多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块希望的田野上生息繁衍，孕育了许多优秀的儿女，创造了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风格的人文景观，给琅岐岛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使琅岐岛赢得了“海屿邹鲁”的美誉。

在福州琅岐岛上规模最大、装饰最精美的祠



正谊堂

堂当属下岐董氏宗祠。宗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约1522年），重修于19世纪20年代初，1997年董氏宗亲又捐资百万重新修建，精雕细琢，耗时2年才得以竣工，现已被列入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整座宗祠就像一位母亲，虽历尽风雨沧桑，却总是海内外董氏宗亲心神向往的地方。宗祠融古今建筑于一体，在下岐董氏后人七十多年的精心守护下，仍然金樑巍巍、玉柱振振、流光溢彩、美轮美奂、气宇轩昂。

宗祠总占地面积约1380平方米，主体建筑共有五进，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祠门牌坊为楼阁

式双檐歇山顶，雕龙画栋的横匾上写着“正谊堂”金色大字。《汉书·董仲舒传》云：“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先祖取“正谊”为琅山董氏族裔的堂号。

祠前有明埕，立有一对石狮，朱红的大门上方刻着“董氏宗祠”，楷书端庄、苍劲有力。董氏后人酌水知源，不忘祖恩，祠边一直保留着两口古井，一是南宋绍兴年间开渠的“梨园井”，另一口是明嘉靖年间董伯章开的古井，由宰相叶向高命名“董公泉”。

步入宗祠的东大门，映入眼帘的抬梁穿斗木构架，工艺极为精致，造型生动，真是巧夺天工。空气里浸润着一股木香。这种清香有别于祠堂的香火味，有着悠长绵延而又含蓄、内敛和深沉，仿佛与生俱来，温暖而亲切，是亲人和乡邻的气息，在祠堂上空盘桓不散，挥之不去，似乎加持了一层仙气。

祠内檀椽斗拱，悬钟流金溢彩，藻井人物、飞禽走兽、云龙翔凤栩栩如生，金碧辉煌。站在天井中央可看到屋面为金色琉璃瓦，飞檐翘角，彰显出庄严肃穆与古朴典雅的气质。

如今的董氏宗祠依然保留着明代古宗祠的规制。在大厅的插屏门上悬挂“节钺传家”匾，与董氏“忠孝礼义”的家训交相辉映。两边墙壁上镶嵌着青石影雕十幅，图文并茂，展示董氏先贤的丰功伟绩。在神龛的上方高悬着明朝崇祯皇帝钦赐董养河的“帝座纶音”巨匾，熠熠生辉。厅内还悬挂着“父子世进士”“布政使”“通远军节度使”“朝奉大夫”“进士”“文魁”“三策堂”等三十多面名贤牌匾，展现出琅岐董氏人才辈出、簪缨不替、文武阀第的风采。

祠内中庭花岗岩盘龙石柱上所刻的27副楹联大多出自历代宦宦、名人、书法家之手笔。如“衣冠清节传三世；祠赋声名著两都”，此联乃明朝兵部尚书黄道周赠董廷钦子孙三代的手书，说的是董廷钦为官清廉，而且他们的词、赋、诗、文名著两广。祠内长联之最“豢龙传帝世溯范阳发族嵩山琅海喜联辉纘承先绪；旋马起家声自宋代登科名宦才人欣辈出丕振宗风”，书法家赵玉林所书，用42个字，言简意赅地讲述了董氏族姓的起源、始祖祖籍、迁居时间、繁衍播迁、家风传承、世次行第、郡望门第，内容通俗流畅、别具匠心，体现了中



南宋一世祖董宗本



下岐董氏族谱



崇祯皇帝赐董养河匾



董氏宗祠内景

华楹联的大美之处。

在琅山董氏的族谱里记载，一世祖董宗本，字纯永，原籍河北范阳，大致位于今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地理位置。于南宋高宗绍兴年，为避乱举族“衣冠南渡”入闽，择居琅岐岛。

宗祠的“怀贤楼”中，陈列着董氏历代先祖遗像、传志、家谱、家训、诗词等族史资料，其中有明朝宰相叶向高，状元翁正春，兵部尚书黄道周，进士林烜、董应举、董和等人的手迹。还有一块“皇明诰封董母程宜人墓志铭”，是明朝万历进士杨翟崧所书。这些都是族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激励子孙后代敬仰祖先、敦亲睦族，慎终追远、自强不息，为国尽忠的期望。

宗祠后面是“豢龙园”，为董氏宗祠的后花园；豢龙的来历说的是董氏的始祖董父，属轩辕黄帝派系，出于姬姓，黄帝的裔孙廖叔安生董父，好养扬子鳄（古代称龙），服侍于舜帝驯养龙，以事有功，赐予“豢龙氏”，即董姓。

琅岐董氏宗祠文化底蕴深厚，恰似一部百科全书，一部浓缩的家族史。人们守护“她”不仅是一座古建筑，更是一种乡愁、守望与传承。

二

当我还是孩提时，爷爷讲过琅岐山海经的故事。古时候，岛上只有几座山峰屹立在海上，云雾缭绕，四周海浪翻腾，先民们依水而居，以

海为田，捕鱼蟹为生，勤劳勇敢，生生不息……斗转星移，沧海变桑田，经历代先民们开发与建设，如今这片独特可贵的冲积平原有着“到处有诗境，随时有物华”的风光景象。每年都会举行“开海节”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习俗活动，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从宋淳熙《三山志》的文字记载琅岐开辟于唐代，那时佛教兴盛、人文蔚起。

琅山董氏受董仲舒儒家文化的影响，世代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因此历代科甲蝉联，簪缨鹊起，绳绳继继。12世董焯，字光叔，首登宋理宗绍定壬辰科（1232）进士，历官知县、湖南观察判官。他的儿子董璜，字惟玉，宋理宗淳祐庚戌科（1250）进士，历四品文官中散大夫，父子双进士。13世董汝庆，字会泰，宋理宗时任武阶，授忠训郎。18世董和，字积中，号节斋，明永乐戊戌科（1418）进士，授户部山东司主事，从五品迁员外郎，又命督淮常盈仓等，后擢从二品贵州布政史，卒赠布政司，荣封三代中大夫。19世董宗道、董宗成明宪宗成化六年（1471）辛卯同榜举人，曾轰动一时。22世董廷钦，字仲恭，号海门，明万历七年（1579）乙卯科举人，授江西金溪县教谕、典湖广，万历十七年，擢南京国子监博士，分管教育的官员，后迁钦州知州，历任广东韶州府同知，广西思明府同知，累左迁岳州通判，再迁靖江王长吏。他的长子董养斌，字叔允，明万历太学生，授光禄寺署丞；次子董养

洙，字叔鲁，明万历己酉，顺天府榜11名考县丞；三子董养泓，字叔理，明万历庚子科举子，崇祯己入太学，庚午科贡举，授南直隶宿州同知；董廷钦四子董养河，字叔会，明思宗崇祯己卯科乡贡，十五年（1642）壬午科钦旨特赐进士，授工部司务，迁员外郎兼兵科给事中，继命监督九门，又命监督芜湖钞关，崇祯皇帝赐“帝座纶音”。董养河之子董谦吉，字德受，崇祯辛未科（1631）进士，授建宁教授，逾年迁国子监博士，历户部员外郎，后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四子董师吉，字德容，清顺治四年（1646）授广东惠州府河源县知县。琅山董氏书香世守，董廷钦一门三代连科，祖孙五经博士，父子两广大夫，传为佳话，成为琅岐四大名门望族之一。

董氏宗祠记录了琅岐董氏的家族荣耀，后人散布世界各地，但每逢清明节、重阳节、春节时，董氏后裔包括台湾的宗亲都会来到这里寻根访祖。时光追溯回下岐董氏17世，董珠牲育有两子，长子董肇（禄房）、次子董良，董良生18世董亮，开始分为福、寿、康、宁四房。董亮公（福房）、董亭公（寿房）、董膏公（康房）、董藁公（宁房）四个兄弟，子孙兴旺，目前已传到四十二世。其中清顺治年间，29世董天明、董天鬯迁居到福州西门外关源区浦前（今闽侯县荆溪镇关源浦前村）、康房第一支也迁往闽侯荆溪镇溪下村，如今居于闽侯荆溪镇尚有130余户，董氏后人400多人。

太平盛世，建祠修谱，供人景仰，当然是每个宗族最隆重的事情。祖先都想让后人学好、过好、一门清正。据说族里有犯事违法的人，是不准进入祠堂的，也是上不了族谱的。这可是天大的事，一个人入了“谱”，心里才会踏实。现存的《琅岐董氏族谱》分为上下卷，为大16开竖排印刷本，收藏于福建省图书馆和琅岐董氏宗祠。董氏迁琅，历宋、明、清三个朝代，共出进士6人，举人8人。这些董家精英，莘莘学子，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或名噪京都、或在州县为官，官勋炳烺，政绩卓著，诗文出众，笔墨飘香，有些精英被当地父老乡亲拥戴立碑缅怀，设祠堂奉

祀，有的摩刻诗文，流芳千古，耀祖光宗。

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琅岐董氏当代名人、企业家层出不穷，如物理学博士董志文以及文化人董承耕、董拔萃出版了多部专著，如《面向21世纪选择》《少年强则国强》，撰写《点击台海》《“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石》等优秀著作。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光灿烂，若出其里。董氏宗祠默默地传承着家族的文化和精神，续写着家族的历史与辉煌，庇护着董氏子孙的爱与希望。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唐代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倾吐了多少游子人生的慨叹和对故乡的依恋。魂萦梦绕的故乡啊，无论我们相隔多远，无论历经多少岁月的沧桑，只要宗祠在，心就在，根就在。



琅岐 817 街景



福清人为何爱闯荡东瀛

◇何华龙

福清人素有闯荡世界、冒险吃苦、勇创大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据史料记载，从宋末元初开始，福清乡亲就凭借海运便利的条件漂洋过海，到异域谋生。当时绝大多数是当苦力，只有少数人经营商贸或运输业，主要分布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亚洲国家。

福清有一句土话，叫“え棺材，め草葬”（福清话这两个字的发音与日语的え与め发音有点相似），意思是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绝不过平庸的生活。这种文化观念深入福清人的骨髓。正如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说的：“富贵不归乡里，如衣绣夜行，谁人知者？”福清人所谓成功，就是起大厝、开好车，做个有钱人。因此，去日本淘金回来后一定要盖房、买车、娶媳妇。

据相关资料，福清人东渡日本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中叶就有福清人前往日本贸易了。明嘉靖十三年（1534），“福清冯淑等三百四十人泛海通番”（明·董应举《崇相集》第二册《漫言》），

在海上遇风，被朝鲜李岨王朝连人带货一并解往辽东。“咨称闽人向无汎本国者，顷前后获千人，皆市易日本”。（明·茅瑞徵《皇明皇胥》卷一《朝鲜篇》）。嘉靖二十六年，前往日本贸易的福建海商因遇台风漂流到朝鲜的就有1000多人（清道光《福建通志》《通纪九明二》），其中不乏福清人。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福清，不但抢夺财产，还掳掠人口贩卖外洋为奴。福清人俞体仪和俞添祖的儿子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倭寇掳掠出去的。到明末崇祯年间，倭寇仍在福清新厝一带掳掠人口。这些被掳掠到外洋为奴，或是逃往海外谋生的福清人后来也成为华侨。

从明朝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福建沿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要求扩大市场，加强海外贸易，积极贩货到海外。万历三十七年（1609），“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鱼槽大船，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为水手，金土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习海道者也，为之向导；陈华，谙倭（日本）语者也，

为之通事”（王在晋：《越镌》，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由长乐起航，前往日本贸易。此后因经商而滞留、移居日本的福清人逐渐增加。日本政府曾划长崎为开放口岸安置他们。福清海商船主林太卿字楚玉，1609年东渡到鹿儿岛，在当地娶妻生子，十年后全家移居长崎。另一位福清人何高材，字毓楚，也是海商船主，1628年移居长崎，1671年逝世，葬于长崎。随兄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的魏之琰，从事安南东京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贸易，娶东京王族武氏之女为妻，门庭显赫。大越嘉宗阳德元年（1672），魏之琰携两个儿子和仆人自安南移居长崎。

日本是崇奉佛教的国家，有不少福清人因弘扬佛法而移居日本。渔溪黄檗寺隐元禅师及其他东渡弘法的僧众，是明末清初旅日福清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中国杭州僧人逸然，久闻隐元盛名，便想请他到日本传教弘法。经幕府许可后，逸然自1652年至1653年，或馈书赠币，或派弟子古石、自恕到福清，前后4次邀请隐元去日本。隐元为逸然诚意所感动，加上弟子也懒性圭应邀前往日本长崎崇福寺不幸在海上遇难，遂坚定了迎难而上的决心，把万福寺的法席让给弟子慧门如沛，于1654年6月3日辞别寺院僧众，以63岁高龄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大眉性善等僧俗38人（其中僧人30个），经厦门东渡日本。当时随隐元赴日的弟子名僧中，有即非如一、道本寂传等福清人。隐元的成功东渡与郑成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其母田川氏是日本人，其父郑芝龙是旅日华侨。郑芝龙船只来往于中日之间时，就常有福清人搭乘其船前往日本。隐元赴日，就是从厦门乘坐郑成功的“国姓爷”军船东渡的。隐元7月5日抵达长崎进兴福寺，受到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隐元的东渡，使沉寂多年的日本佛教界为之一振，许多名僧相继归其门下。由隐元开创的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的重要派系。据日本学者宫田安的调查统计，至20世纪90年代仍遗存在长崎崇福寺后山的唐人墓，有碑者计277人，碑上刻有死者的姓名、原籍、身份、去世日期

等。属闽籍者225人，其中福清籍96人。

清初，中国沿海一带人民支援郑成功抗清，清廷遂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逼迫福建沿海居民迁入离海岸30—50里的内地。造成田地抛荒，家园废弃。一部分流离失所的灾民和不愿降清的人便偷渡出洋。1661年，福清人王一等冒死搭上开往日本长崎的一艘帆船到海外避难。

福清人大批赴日是在19世纪末期，1870年，长崎的华侨有462人，其中福清籍的200多人。20世纪初（清末民初年间），福清一部分知识分子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到日本留学，很多留学生娶了日本姑娘为妻，一部分在日本定居，一部分带着妻子回到福清。其代表人物有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郑汽辰、林孝楼等，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航运事业的发展，大大方便了华侨的出入境。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援引下，纷纷前往日本做生意，并在那里成家立业。据1964年11月对旅日华侨普查统计：高山、东瀚、三山、港头、龙田等5个乡镇，共登记旅日福清华侨431户，总数2300余人。其中1937年以前赴日的318户，1945年前赴日的17户，1949年前赴日的9户，1950年后赴日的14户，在日本出生的73户。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通信联络的183户，分布在东京、神户、横滨、长崎等59个县市。1988年，福建师大历史系对福清市高山镇和东瀚乡等地151名旅日归侨的抽样调查，也表明60%左右旅日华侨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往日本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华侨纷纷回国，仅福清高山镇薛港村就有27户旅日华侨返回故里。

日本战败后，一部分日本的家眷逃难到了福清，一些日本的姑娘嫁给了福清人，在福清定居。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人可以回国定居，一部分战争遗孤也带着他们家人回到日本。福清的日本人回日本定居，往往带走了一个家族；村里面的大部分人又以七大姑八大姨的名义一起回到日本。因此在福清的沙埔镇、东翰镇有好几万人都到了日本定居。

福清有个别号，叫“地瓜县”。因为沿海多



2018年中国黄檗文化日本夏令营

沙地，这里无法种植水稻。当地人的粮食以番薯（也叫“地瓜”）为主，有“三片地瓜一碗汤，镰刀挂壁饿断肠”的说法。特别是龙高一带常年干旱，缺粮，常常吃地瓜配“蚵仔”（在福州方言里，海里一种比一般人常见的银鱼更小或跟银鱼差不多大的鱼统称为“蚵”，或称为“蚵仔”“鱼蚵”），所以外地人把福清人叫做“福清蚵”，比作不值钱的“蚵仔”。这是改革开放前福清的状况。

1978年，福清全县的生产总值仅1.32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137元，两项都是福建省倒数第二名。1979年，福清全县农村实现联产承包到组的重大改革。高兴之余，亦忧心忡忡。主要原因是福清地少人多，劳动力明显过剩。以高山镇前王村村民王朝斯为例，全家6口人分到两亩地，番薯留作口粮都不够，花生卖钱，一角钱一斤，亩产500公斤，收成中的1/3要上缴国家提留，饭都吃不饱。村民林民清和刚成人的儿子林镜伟，

一家人分到了一亩地。一亩地能干什么？一家人仍是地瓜果腹。高山镇前王村村主任王有强说，当时很多人觉得，与其在家年年吃地瓜，不如出去闯荡搏一把。

去哪？东渡日本。福清人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准备重走老祖宗的求生路。

看到同村有胆大的在国外发了财，那些有心没胆的人也铁了心。往往一个家族只要出去了一个人，家族其他成员就也纷纷步其后尘，亲戚带亲戚，在日本各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福清同乡会，他们在外统一有个响亮的名称——福清哥。

1978年12月，中国政府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方针，作为人才培养政策，开始重视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当时，日中战争结束已久，其间日本实际上中断了接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1978年—1981年，属于留学生大规模派遣工作恢复和摸索阶段，这个阶段只有公费留学，不能自费留学，这一时期国家留学工作方针是“广

开渠道、力争多派”，要求增选留学预备人员3000人以上。为做好留学派遣工作，教育部增设了留学生管理司。1981年—1986年，公派留学继续发展，方针仍然是“力争多派”，但同时要求“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

中国赴日留学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稳步增加，这得益于1983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倡导的“留学生万人计划”。而中国政府允许自费留学，也进一步推动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很多上海和北京的年轻人赴日。1996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上海人在东京》描写的正是这段时期上海人在日本东京留学、打工生活的情景。

1987年，福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福建64个县(市)中排名倒数第三，一直是福建有名的贫困县。这时候，侨居国外的福清人和长乐人与国内亲属联系开始增多；当地人对国外生活也开始了解，“出国”成为当地一件荣耀的事情，赴日人数迅速增加。到了90年代，许多高中未毕业的人伪造毕业证书非法入境日本，在日中国人数量急剧增加，到20世纪末，达到数万人次。

在出国热中，福清人以出国日本的居多。他们以“留学”“商务考察”“婚姻移民”等形式去到日本。他们大部分在日本艰苦奋斗打工赚钱，什么苦活脏活都干，名校生到餐馆洗碗端盘子，文弱书生去建筑工地背水泥袋，而且一旦失去工作，马上就会陷入没饭吃、没书读的境地。他们只是短期居留，有的居留三四年，多的达到七八年，赚到钱后就回到家乡福清，或购建房产，或办厂开店兴业，对福清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出现了第三次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2008年，日本政府提出“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为了在2020年之前实现该目标，以名牌大学为首的日本的大学展开了留学生争夺战。现在这场竞争进入收尾阶段。各大学争夺尤为激烈的是中国留学生。据2017年5月日

本学生支援机构调查，日本的留学生总数约为27万人，其中中国人最多，占40%，突破了10万人。

但是，随着福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福清人赴日本的目的和留学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赴日本的是刚成年的年轻人，他们的目的是到日本学习语言，进入日本大学深造，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即使打工也只是体验日本社会，同时挣一点零花钱。可以说，这一代留学生更加自信，在经济上更加充裕，他们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在中国的家庭提供。在了解到上一代中国留学生曾经“疯狂打工”的“过去进行时”，他们甚至觉得惊讶与不解。而现在，有些饮食店开出每小时1500日元工资，都招不到中国留学生。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随着中日两国人民的频繁来往和文化交流、经济关系的密切，华侨对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世界和平，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古厝背后的传说

◇林展飞



闽侯人民历来十分重视自己的房屋建筑，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居家文化，不管是院落的设计还是室内的装饰，处处体现着主人的愿望与情趣，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宋代福州太守曾子固《道山亭记》云：“麓多杰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钜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闽侯俗语有“人生三大窟，厝窟、墓窟、灶窟”，厝、墓、灶关系着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其中房屋排在第一位，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深宅大院或是简易平房，都视为人生奋斗的头等大事，有着各自的故事和传说，或是简单，或是传奇，无不体现时代的烙印和人们心中的祈盼。今介绍几则古厝背后的传说，与大家共享。

敦厚建祖厝故事

闽侯县南屿旗山森林公园景区之中，有一村庄，叫双峰村，走进双峰村，仰望高处两块巨岩突兀，双峰并立，故名双峰。后山峰为旗山最高处“大岩顶”，站在“大岩顶”上放眼远眺，旗山在云海苍茫之间，闽江上白帆远影，更添诗情画意。旗山森林公园建成后，村民依山傍水，建设了宾馆、饭店、旅游商店，开设别有风味的野炊、烧烤等项目。双峰村居住有上百户人家，全村姓吴，其民风民俗颇有特色，古民居、宗祠、注福寺、正月十五迎神活动等成为人们旅游观光

新项目。

明弘治年间，闽县螺洲吴厝村吴姓十一世祖吴恒夫迁到侯官县南屿双峰村。当时，这里还是非常僻远的山区，只有吴姓、蔡姓几户人家，四面苍峰翠岳，满山树木碧绿，是个远离纷争的世外桃源。吴家人在此劈山造林，男耕女织，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至清乾隆年间，十九世祖兴盛产下一子，按照宗族第二十世排序为敦，取名敦厚。敦厚年少时，由于家庭贫困，很早就开始跟父亲学习加工竹制品，至稍年长，经常肩挑竹制品到上街一带出售，路上常受地痞流氓欺侮。为了防范土匪入村侵扰，外出售卖时防身，兴盛便要求敦厚学习武功，几年下来，敦厚学到一身武艺，长成帅气的年轻人。有一天，已过而立之年的敦厚到上街沙堤村沿街叫卖竹制品，当地几个流氓见敦厚单身一人，以为好欺，就上前敲诈围攻，敦厚不甘示弱，奋起反击，引来众多的旁观者。这一仗，他不但制服了坏人，也打出了声威，受到沙堤村一位赵姓绅士赏识，欲将女儿许配给他。敦厚因祸得福，娶赵女为妻。赵女面有七痣，相师指点谓之“七星痣”，为富贵命的吉祥痣。赵女过门后，夫妻恩爱，两人共同劳动，日子幸福美满。赵女非常勤劳，每天上山牧羊还兼拾柴草，却发现每日都有一群白羊戏弄她，将她所拾柴草衔走，弄得赵女经常空手而归。

一天，敦厚问妻子说：“汝每天上山牧羊、拾柴，为何不见柴草挑回？”赵女遗憾地说：“我每日都在拾柴，可是，都被一群白羊衔走，真没办法。”敦厚听了感到奇怪，后山哪有白羊，一定要弄个明白。次日，敦厚暗中尾随妻子来到后山，看见妻子边牧羊、边拾柴，一会儿，一群白羊果然出现，把柴一根一根衔到草丛中去，敦厚赶紧偷偷跟上白羊，来到一洞口，白羊不见了，敦厚立即挥锄深挖洞口，挖出了三缸白银。敦厚发了一笔意外之财，马上富裕起来。

敦厚有了钱，就对妻子说：“现在有钱了，想寻个好的地方盖座房子，希望将来财旺、丁旺。”为了慎重起见，敦厚请了几个地师来选址，结果都不合意。有一天，敦厚听人说福清石竹山仙翁祈梦非常灵，就与妻子商量，安排个时间走一趟，到福清石竹山祈个好梦，选块风水宝地。第二天，敦厚为表示诚意，早早起床，沐浴更衣，吃过素菜，从旗山一路走到福清石竹山，在仙翁座前烧了香，讲明原由，祈求给个好梦，就在殿堂边上躺下。一会儿，敦厚做了一个梦，梦见仙翁跟他讲：“上岩坛下，下岩坛上，风水就在妻子裤跨下。”回家后，敦厚把梦中的情景跟妻子说了，夫妻俩商量了几天，感觉很奇怪，跨下怎能盖房子，是不是自己没跟仙翁讲清楚或是什么时候得罪仙翁，怎么给这样一个梦，分明是骂人的梦。过一段时间，夫妻俩还是想不明白。敦厚又下山请了一位风水先生上山。风水先生在山上找啊找，找了好几天，一直没找到满意的地块。这天傍晚，敦厚与风水先生还在一起找地，见妻子把羊从圈里牵出来，在树林中找了个青草长的较密的地方，蹲下身子，把羊桩打入土中，不让羊到处跑。突然，风水先生异常兴奋地叫她不要动，拿着罗盘在她打羊桩的地方一测，大声地说：“太好了！就建在这里，真是好地。”敦厚也赶紧过来，端详一会儿，感觉真是好地，这时夫妻俩才恍然大悟，原来仙翁所说的跨下是在这里。

新房前后三进，达二百余间，占地六千多平方米，是双峰村最大的建筑群。吴氏后人在这

不断生枝发芽，人才辈出，敦厚曾孙在清道光年间考中中式武举任千总；民国时期，敦厚后裔吴华连、吴耀琼等五人考进黄埔军校；解放后，考进大学，成为国家各类人才的更有许许多多。如今，双峰村已建成为繁荣昌盛的美丽村庄，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旅游。

溪源寨林有宜建土楼故事

溪源寨土楼坐落于闽侯县鸿尾乡溪源村西。始建于清咸丰三年（1853），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土楼呈方形，坐西朝东，占地约6000平方米，房、厅共288间。土楼背枕竹高山，面朝辽阔秀丽的田野，远处层峦叠嶂，群山起伏，穆源溪水绕过寨堡，向西北缓缓流去，经过鸿尾乡，汇入滔滔闽江。

相传清道光年间，溪源村林有宜早年家道贫寒，从小就给人放牛、砍柴。后来为谋生计，林有宜到鸿尾乡南阳村“朱百万”家当长工。“朱百万”是尤溪县南宋理学家朱熹后裔，因社会变故迁到南阳村，当地有童谣称：“南阳朱百万，钱粮跨三县，七品县老爷，当官他不换。”林有宜先是为朱家放牧牛羊，俗话说“鬪牛连拾柴，鬪羊连啼嘛”，但再苦再累，也没有难倒林有宜。他每天早出晚归，把朱家的牛羊看养得壮壮的，傍晚还带一担猪草回来，一到家立即扫羊栏、清牛厩、冲猪圈，从不偷懒。

“朱百万”有个漂亮、精明能干的妻子，人称朱夫人。她有文化，善经营，为人慈善，朱百万对夫人言听计从。朱夫人为“朱百万”生儿育女，她最疼爱的是小女儿。自从林有宜到朱家后，朱夫人经过观察，觉得林有宜机灵、敏锐、勤快、乖巧、善解人意。朱夫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不久，就特许林有宜与小女儿一起上朱家私塾读书识字，朱小姐对待林有宜就像亲哥。林有宜长大后，魁梧英俊，气宇轩昂，又刻苦好学，犁、耙、播、割、挑等农活样样上手，加上做事勤快，又能为主人分忧，深得朱百万夫妇赏识，也获得朱家女儿的爱慕。有宜对小姐也是一往情深。后来，有宜被提升为管家，钱账一清二



溪源寨

楚，毫不含糊。几年后，由私塾老师做媒，朱夫人作主，将小女许配给了有宜，还送了五亩薄田作为嫁妆。

成婚后，有宜的妻子放下小姐架子，努力适应农家生活，相继生下了建邦、建亨、建贞、建发四个男孩。有宜吃苦耐劳，辛勤耕作，友善待人，家庭越发兴旺。渐渐有了一些积蓄，就在当地开了一家商铺。日积月累，钱财日进，有宜夫妇喜在心头，决心要为子孙建造一幢全溪源最大的房子。有宜的妻子把他们的打算告诉母亲，母亲听后很高兴，觉得自己没有选错女婿，决定帮助他们早日实现愿望。

这时朱夫人年岁已高，思念女儿，时常用轿子把女儿接回家小住几天，一则享天伦之乐；二则每次女儿临别时，朱夫人都会亲手抱一瓮糟菜，还在瓮中悄悄地放一块金砖，让女儿带回家。为免路上遭土匪打劫等不必要的麻烦，她送金砖给女婿的事，从不声张。直到有一次，朱小姐抱一瓮糟菜坐轿回家途中，打盹时双手一松，糟菜瓮落地，摔成两瓣，才被轿夫发现了秘密。道光末年，林有宜就用自己辛苦积攒的钱及岳母

赠送的金砖，请来地理先生，选定了这块风水宝地，还用高薪请到出色的建寨师傅全盘设计，聘请工艺精湛的建筑技工。通过几年努力，闽侯县最大规模的土楼拔地而起。他还用剩余的钱，添置良田十几亩，留给子孙耕种。

关源里正益厝的故事

清康熙年间，闽侯县荆溪关源里有一个年轻人，姓李名正益，平时游手好闲，嗜赌成性，逢赌必输。家人一直劝李正益戒赌，安心务农。李正益总是左耳进，右耳出。一日，正益的姑妈回娘家，见众人劝正益戒赌无效，就拿出一些银两，叫他去买些鸭苗喂养，希望通过劳动，戒掉赌博，并能得以谋生。

第二天早上，李正益怀揣银钱，从关源走路到洽浦码头，坐客船前往福州购买鸭苗。在洪山桥下船时，看见一年轻人被船家揪着衣领欲打，正益见状上前拦止，问明原委，是年轻人无钱买船票所致，当即为其付清船票。年轻人对正益的举动非常感激，邀请正益一定要到他家做客。正益告诉年轻人，自己要去购买鸭苗，怕误了时



间。年轻人对正益说，买鸭苗的事你放心，明天我会派人买好鸭苗送到你家。正益心想，身上钱现在买鸭苗也不够了，于是，就跟随年轻人走。到年轻人家时，见他命家人开三重大门迎接，并设宴款待。这时，李正益才知道年轻人是福州知府，只身去闽清暗访，回来不知何时遇上小偷，被偷个精光，以致无钱购买船票。席间，知府询问了正益家庭情况，知道正益家境贫寒，有意留其在府衙当差。正益说自己不识字，不会当差，还是回家种田、养鸭好。知府觉得正益为人诚实，纯朴敦厚，为答谢正益出手相救的恩德，遂赠送一笔可观的银两。

李正益得到这笔赠银后，回关源买田置地，建设房屋。房屋坐北朝南，土木结构，沿中轴线三座递进，每座六扇五间，进深五柱，房屋占地总面积22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乡人称之为“正益厝”。后正益成家立业，子孙满堂，正益与知府之间的佳话在当地广为传诵。

大目溪楼下里古厝传说

闽侯县白沙镇大目溪村四面环山，溪流像一条玉带从村前流过，溪的一边称大目溪，另一边称过溪。

清初，大目溪村有个年轻人叫张武进，上山砍柴、垦荒栽番薯和打短工为生。虽家境贫困，仍可勉强度日，一家人与世无争，生活过得安宁而又祥和。

有一天，张武进到大目溪山上垦荒。他看中一片山坡地，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坡上草木丛生，想在此垦荒、栽些番薯。他劈光了坡地上的草木，用山锄不断地挖掘，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一片生地太阳的照射下，散发出特有的芳香。张武进心里高兴，干劲也更大了，挖得也更快了。突然，张武进发现地上金光一闪，很快又没了。他赶紧放下山锄，在土里寻找那闪光的东西。很快地，他找到了，原来是一块金元

宝！他用衣服擦干净金元宝上的泥土，发现元宝的底下刻有一行小字：“与广东梅州府大浦县叶家村叶小山平分。”

当天中午，张武进拿着金元宝与家人商量，准备去广东找叶小山平分。村中有好心人听到了，上门对张武进说：“武进，你傻啊！这里离广东千里路程，走路要几个月，路上盘船过境又辛苦又危险，住房、吃饭等等都得花钱，最后能余下多少钱？况且叶小山是谁，有没有这个人谁也不知道，你一个人独得了谁也不会说你什么。”张武进说：“这怎么可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做人要清白，信义第一，不可见利忘义。”张武进执意要去，别人阻挡不了，只得由他去了。

张武进带着金元宝，一路上披星戴月，风吹日晒，不知向多少人问过路，爬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溪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果真在一处偏僻的小山村找到了叶小山这个人。叶小山把张武进让进家里，坐在天井边的椅子上。张武进说明原委，拿出金元宝给叶小山看。叶小山年纪与张武进差不多，家庭也不富裕，听了张武进的陈述，非常感动，对张武进说：“你千里迢迢从福建特地送过来，沿路吃了不少的苦，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路上还要不少的开支，你的情意我心领了，金子不能要。”张武进和叶小山两个人你推我让，在天井里推来推去。这时，张武进看见门边柴堆上放有一把斧头，他一把抓起斧头把金元宝劈成两半，不巧，其中一半金元宝跳起来，掉落天井的条石缝里。叶小山拿来钢钎把条石掀开，寻找那一半的金元宝。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条石底下露出满满一坛金光闪闪的金元宝！两个人惊喜无限，真是上天赐给金元宝。叶小山对张武进说：“这金子虽然是从我家挖出，但是你带来的，是你的信义带来的，托你的福才有了这坛金子，你好人有好报，这金子我们也要平分。”

两个人让来让去，最后平分了这坛金子。张武进送去一个金元宝，最后却拿了半坛金子回家。张武进回到大目溪后，请地师在溪边找了一

块宝地，建起了四楹三间拔尾出游廊木瓦房，房屋左右马鞍墙，厅堂雕梁画栋，两边镂花门窗，气势宏伟，成为当时大目溪村最漂亮的房子。至今100多年过去了，乡人称这座房子为“楼下里古厝”。张姓子孙秉承“清白做人，信义传家”的祖训，不断发扬光大。现楼下里古厝仍保护得较为完好，成为大目溪村标志性建筑之一。

叶志统建屋没目覷

闽侯县鸿尾乡流传着一句俗语：“志统公企屋没目覷。”说的是鸿尾叶氏第七代孙志统建房这么大的事，连正眼都不看一下的故事。叶志统生于清雍正年间，自幼家境贫寒，寄居于叶氏祠堂，常被人嘲笑。长大后去南平当学徒，他勤学苦练，为人诚恳，深得老板赏识。五年学徒生涯，叶志统掌握了一些生意本领，结业回家时，老板不但给他五年工钱，又资助一笔可观的资金鼓励他创业。

志统回到鸿尾家乡，创业目标选在鸿尾石门山北向名为“下底山”的一大块山坡地，这里面对闽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对林木生长相当有利。志统在那里购地开荒，植树造林。后又进一步扩大购地，继续开垦造林，几年间竟造就了四百多亩的大片森林。这片森林经他三十多年苦心培植后都成了材。那时正值乾隆盛世，举国兴旺，到处都在建设，需要大量木材，这片森林不断升值。志统大量砍伐木材，经闽江运抵福州或周边县乡大力推销，经济实力得到奇



楼下里古厝

迹般的大发展。此时，他回家仍寄居在祠堂里。

有了钱，志统首先想到建房，而且觉得自己完全有实力建大房。于是，志统就开始筹备建房事宜。同村人听到志统要建房的消息，认为这是大新闻，一个居祖祠几十年的赤贫穷汉，突然要建房，还要建大房，并且选在鸿尾村中部的一大块平地。村中传说志统建厝要求对所用石材、木材标准要高，建造的款式要美观，工匠技术要精，宣称各项指标都得超越鸿尾各大厝的最高标准。还要工期短，进度快，口气如此之大，这可怪了！不知情者都认为这是笑话，不过笑话而已。也有的人猜想是志统“拾路银”了，才会如此大夸海口。

志统建房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当时是他木材出售最忙的时期，无心兼顾建房，为保证工程质量，志统请了最优秀的工匠班子，他对工匠负责人说：“我没时间觑你们的工程质量、进度等，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看着办！”表现出志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处事风范。志统这种完全

放手，对工匠充分信任、尊重的心态，大大促进了工程进度。工匠也不负志统所望，统筹兼顾，精打细算，精心施工。传说他们在一夜间竟将一座八扇七间房屋的中间厅堂、主排架、柱梁等整体架了起来。这在当时建筑上简直是奇迹。这种双方彼此信任，高度负责所产生的高速度、高质量在乡间一直被引为美谈，所建房屋从质量到款式堪称鸿尾村一流。“志统公企屋没目觑”成为乡间引以为豪的故事。

民国7年（1918），鸿尾村遭遇大灾难，整个村庄被山上下来的土匪围剿，一向平静的美丽山庄，刹时里那两三百间住屋，在炮火轰鸣下，烟火四起、烈焰冲天，各大厝纷纷倒塌、人们呼天唤地，哭喊震天。唯有志统厝得以原样保留，原来这是因为厝里一老太太看见前来放火的小头目是她山里娘家侄儿，在老人家出面苦苦哀求下，小头目征得匪首同意而幸免。

（作者附言：感谢吴金萍、陈玉标、洪鼎林、江东海等同志提供资料。）



话说闽清会馆

◇石丽钦

福州市有60多个会馆，半数以上在台江，其中，闽清会馆建筑独特，中西合璧。

闽清会馆原位于台江区帮洲新闽街71号(即原“万侯街”，后改“乃裳路”)，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成于同治六年(1867)，占地约一亩，砖木结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建筑，面积1250平方米。坐东朝西，布局严谨，气势宏伟，明清建筑风格。大门临街，青砖清水墙，花岗石基础，正面用两块花岗石大石板，制三条线脚形成上下两托座，承墙接地，造型古朴，石面磨琢精细。外墙侧面镶嵌有台江区人民政府于1991年10月立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会馆正面大门上方，镶嵌一块阴刻“梅邑会馆”长方形青石匾额；两侧朱漆仪门，拱形石门框，横额两块青石分别阴刻“护国”、“佑民”；两侧外墙窗户采用“百叶窗”式，颇具西式建筑风格；正面窗户却是石制方框，配以简式钢筋栅栏，为传统中式结构。会馆进门石板地坪，原建有木构戏台；坪两侧砖木结构楼房，土砖墙，木地板。大堂悬山顶，斗拱云眉，堂前屏门花格，原有木构戏台、酒楼和三座品字形三层鼎立的楼房，及后面两侧杂房、厨房等。会馆大厅进深约10米，有金塑莲花亭，三尊大菩萨及黄天君、马将军等神祇木雕塑身，特别抢眼的是厅内一对长3.2米，直径0.67米雕刻精美、形象逼真的蟠龙青石龙柱，青龙盘柱翻腾，间以如花云朵，龙体龙须镂空，雕刻玲珑剔透，是少见的镂空石雕艺术珍品。龙柱上分别刻有“同治丁卯年”“虎邱黄公建”字样。

闽清会馆建成后，便成立旅榕闽清同乡会，对会馆进行管理；后又成立上下“公帮局”，对停泊在帮洲的闽清米船及船工提供帮助。不久，闽清旅榕商家和米船船主又在旁边集资兴建了一座面积达2500平方米的“保安堂”。

自此，常年航行在闽江上游至福州的闽清米船船工在福州便有了“娘家”。他们泊船帮洲后，常到会馆办事、听戏、休憩。会馆内还设有医馆，常年都有闽清中医在那里坐堂问诊。闽清船工受伤生病，都可以到“保安堂”暂住治疗，会馆都会予以帮助。船工不治而亡者，会馆及“保安堂”都会进行善后处理。会馆还为船工开路条、写信，帮助告状、写合同。每年春夏时节，闽江涨大水，停泊在福州台江帮洲的闽清米船经常要待上十天半个月。此时，闽清旅榕同乡会和公帮局及后来的闽清民船业同业公会，便会在会馆煮粥，并用小船把粥及佐餐的咸橄榄送给停泊在帮洲的闽清米船工饱腹。

新中国建立初期，闽清会馆成了“新闻小学”，两侧的楼上也住进了许多户人家。“文革”期间，馆内有许多摆设被“红卫兵”拆走烧毁，会馆被破坏得面目全非。1994年，闽清县人民政府驻榕办入驻会馆。2005年6月，台江新闻一带拆迁，会馆由后田迁移到附近的三保街115-8号，原建筑物的主要构件、材料均以“标号重装”的方法移植重建在白马河畔，保持了原建筑的风格。但建筑面积仅640平方米，其规模比原会馆缩水一半，现借给“福建省屏山画院”使用。

如此建筑精美、壮观气派的闽清会馆又是谁来主持筹建？按龙柱上题刻“虎邱黄公建”入手、探究，“虎邱”原指唐末肇基于闽清的黄敦后裔，即闽清黄姓人的代名词（今人皆用“虎丘”，为尊重史实，仍按原文作“虎邱”写）。旧时闽清可称“黄公”的就非黄乃裳莫属了。这也许就是福州有些文史资料称闽清会馆为黄乃裳主持修建的原因。

黄乃裳，字绂丞，又字九美、慕华，福建省闽清县六都湖峰（今坂东乡湖头村）人，是我国华侨史和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毕生竭尽全力，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乡、对侨居地沙捞越诗巫（新福州），都做出了宝贵贡献。闽清会馆是黄乃裳在福州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他曾住在闽清会馆，经常在会馆内组织讲学，给旅榕乡亲和上游来榕船民讲述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宣传振兴中华的道理，以开民智。并印刷《革除缠足论》3万多份，通过闽清米船分发闽江沿线，广为宣传。他还深入调查了解闽清民船业现状，协调帮助家乡民船工人排忧解难、平息纠纷。黄乃裳住在闽清会馆时，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兴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一批实用人才；二是积极筹备和参与领导辛亥福州起义，为福州光复立有功绩。为此，1947年5月13日，经福建省政府批准，将“万侯街”改名为“乃裳路”。“文革”时期，又改“乃裳路”为“新闽路”，现恢复为“乃裳路”。

可是，经查黄乃裳年表，1867年，黄乃裳年方17岁，且刚刚皈依基督教，还在埋头研修英文，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从其当时的社会资历推而论之，龙柱上所指之人应该并非黄乃裳。而且在《闽清县志》“人物传”黄乃裳条下也无此记录。为此，闽清县政协作了专题调研。调查表明，福州闽清会馆由闽清旅榕商家和闽清米船商帮筹资兴建。因工程巨大，费用欠缺，会馆迟迟无法竣工。见此状况，众改推闽清六都坂西巨富刘贵才接手经理、建成。龙柱题刻应断读为“虎邱黄”“公建”。这样，理解为闽清黄姓人共同所建，这应该较为合理。

刘贵才，又名鉴贤，号选亭。闽清县六都坂西村（今属坂东镇），生于19世纪20年代（具体出生年月失记）。其自幼习武，善用重120斤大提刀，武艺超群，清道光武举，例授云骑尉晋赠修职郎，赠武义校尉。

贵才家境殷实，置有大量田产，田租收入颇丰，在福州等地开有米行等商行，成为六都洋大富人家。清道光年间，贵才在坂西村起建大厝，占地面积三四亩，土木结构，雅称“才园”，俗称“贵才厝”。曾以“一时辰扶三十六扇”（两小时内将预制的正座全部36面木构主体框架竖立安装完毕）传为美谈。“贵才厝”正座建造高大壮观，木雕精美。

贵才身体力行“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祖训。时值闽清在福州的商行、船帮筹建闽清会馆，贵才为捐资力倡者之一。但动建后，因资金短缺、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工程难以为继，迟迟未能竣工。后有人请求贵才出面主持，意欲再次募资，将会馆续建完成。正在为闽清会馆建设问题看在眼里、鲠于心中的贵才听后，果断表示：不必再去募捐了，让我来做吧！遂当仁不让地接手会馆基建事宜，亲自主持闽清会馆后期建设。并毅然停止在建的“贵才厝”工程，倾其私人资金捐献于闽清会馆后续建设。且出纳不苟，公正管理。中西合璧、建筑精美的闽清会馆终于同治丁卯年（1867）建成竣工。但也因此造成“贵才厝”横厝无力起建，回照、上座厨房未能隔间，楼上无法铺设楼板等问题。可是，他却在所不惜。一户在六都洋有名的大富人家，资财拮据至如此程度，可见其捐献会馆建设的资金不计其数。会馆落成之日，公众特制一块牌匾悬挂馆内，上书“至公无私”四字，以表彰贵才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贵才逝于清光绪戊戌年（1898），享寿七十多岁。

斯人虽已逝，“至公无私”的牌匾也因岁月磋跎而遗失，但既壮观精美，又局部失建的“贵才厝”却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的豪壮义举，更有千古梅乘的专条记载为其镌刻下光荣事迹，那熠熠生辉的故事正在默默地激励着后来人，继承和发扬其公而忘私、乐善好施的高贵品德。

狮子峰下榴花洞 状元故里东山村

◇杨济亮



许将像



虞寄像

福州城东园中村有圣泉寺和大乘爱同寺，紧邻的东山村狮子峰下有逐鹿榴花洞的美丽传说以及状元许将的遗踪，心中挂念要去一游许久了，而且听闻这两村正步竹屿村、横屿村后脚，面临拆迁，我便趁着假期，独自前往三环边的状元故里。

旧时，人们到圣泉寺烧香，可步行从南街出发，顺着大路经过塔头街到达东岳前（今岳峰村），翻过东岳岭到竹屿，然后环绕山边小路到达潭桥的板桥自然村，之后再从田间小路顺着鹿溪（今考溪）旁的小路迂回而上，经过鹿园（今园中村），再顺着溪旁的小路到达圣泉寺。

从园中村进入圣泉寺要经过逐鹿桥。逐鹿桥由两块花岗岩巨石平行跨越考溪两头，长4米许，宽近1.5米，厚近1米。据说，一块石头重约50吨。桥墩高5米，桥面宽阔，两边没有护栏。此处溪深水急，桥显得十分雄伟。1961年，桥被福建省生物药品厂改名“工农桥”。逐鹿桥边立有一石碑，后被移置于山碑廊。碑高3.5米，厚0.19米，宽1.14米，碑额楷书“逐鹿桥”三字，字径16厘米。碑文多已模糊，从可辨认的不多的文字可见当年募缘的一些姓名及款额。相传唐代宗永泰年间，樵者蓝超逐白鹿经此，渡水入榴花洞，始极窄，忽然有鸡、犬、人家。主者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曰：“欲与亲旧诀，乃来。”遂拿一枝榴花而出，恍若梦中，既而寻之，杳不可得。”《闽都别记》云：后唐五代吴青娘、周启文避难于榴花洞，“只见亭榭俱全，花木参差，又有房舍，曲径中多是榴花，风来摇动，花片乱落，胜似桃源……洞口有一片大石，似可摇动”。后人建了这座“逐鹿桥”以纪念。

传说如陶渊明《桃花源记》般充满了梦幻诗意，惹得宋代几任福州郡守前赴后继游览榴花洞。首先是大书法家蔡襄（1012—1067）写下了《榴花洞》，诗曰：“洞里花开无定期，落红曾见逐泉飞。仙人应向青山口，管却春花



不与归。”此后，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1019—1083）有诗《大乘寺》：“行春门外是东山，篮舆宁辞数往还。溪谷鹿随人去无，洞中花照水长闲。楼台势出尘埃外，钟磬声来缥缈间。自笑守官偷暇日，暂携妻子一开颜。”文学家词人黄裳（1044—1130）也有诗《榴花洞》：“莲社是非外，洞天空色中。一枝樵客梦，两腋石门风。鹿径踪何在，榴花信可通。此缘当邂逅，来接紫光翁。”黄裳，是延平人，神宗元丰五年（1078）举进士第一，政和中知福州，历官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看来，这三位太守公务之暇都很喜欢亲近自然、体悟人生。

从南朝至唐宋期间，东山狮子峰一带，大建寺庵庙宇，弘扬佛法，崇尚善德，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梁大同六年（504）在狮子峰西侧建大乘寺，十二年建爱同寺。唐大中十一年（858），合二寺为一，名大乘爱同寺。582年，为纪念虞寄建虞公庵。唐景龙元年（707），又在狮子峰下建圣泉寺，四年建文殊般若寺，后来又建了眠云院、方山寺等。在很短时间里，狮子峰下就形成了“九庵十八寺”的规模。在圣泉寺的鼎盛时期，唐代宗曾两次御赐匾额“智常藏书所”及“唐藏额”，圣泉寺被提升为国家“御书堂”。

黄裳，在金庸笔下是位用了7年时间“役工屡版”监雕《万寿道藏》而得悟九阴真经上乘道家武功的大内文官。他曾写有长诗《游东山大乘寺》：“奔逸高真避秦侣，远入闽山岂惟楚。落花流水来何处，逐鹿人从石门路。遂造洞门谁得知，鸡黍生涯贯今古。樵客见留何事去，分合随缘落尘土。回头已在尘劳中，手把榴花如寐寤。紫玄素抱超然情，到此令人心骨清。闲踏长林跨深壑，遥见猿鹤来相迎。灵源为我写幽思，但闻历历朱弦鸣。狮子峰前狐退藏，当泯顽空还混茫。龙首涧边云并合，或作人间时雨行。杜鹃有声山意真，杜鹃有花山色明。偶逢奇石可且上（四库本作“坐”），幸乘此兴（四库本作“境”）聊飞觥。顾语娉婷莫予翼，脚力犹争年少轻。三杯通道聊自适，还被谷风吹复醒。忽忽流光已云暮，红烛如林乐声举。”此诗描写了诗人陶醉在大自然中，追求生命真趣的道家情怀。他在长乐云门寺也留下“不须扶我自登山，脚力能胜十八盘”诗句，与“顾语娉婷莫予翼，脚力犹争年少轻”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他确是个不服老的登山健将啊！

历史上大乘寺僧不仅捐资修路，还舍造市井，造福黎民。在东山东侧鼓岭上的佛舍岭，海拔328米，现存有宋大观二年（1108）大乘寺海

务修路题记和眠云寺和尚舍钱铺路记等两段摩崖石刻。摩崖高123厘米，宽96厘米，楷书，纵10行，字径8厘米。文：大观戊子年募缘题，及礼佛会收二百余贯，铺砌古岭并洋官路一条二千余丈，至宣和五年癸卯毕工，共成胜事，庶不朽之功，利济荐亡之福。十一月初三日谨记。大乘化士僧海务、居惠、居讚，同化郑兴、陈、郑、高仪、张问、张满、郑才、陈生、林忻、王八妹、林三娘。今东山村还有一口建于宋崇宁五年(1106)石井，用整块石头凿成圈状井栏，高60厘米，外径96厘米。外壁环刻“大乘寺僧智宣，崇宁五年三月造”。距水井100多米处，另有一个圆形石盂，外壁有“大乘寺僧，崇宁四年智寅舍志”题识。

大乘寺侧的圣泉寺建寺至今已有1290余年，比闽侯县雪峰崇圣禅寺(871)早164年，比福州鼓山涌泉寺还早201年。圣泉寺初名“法华寺”，传说僧人怀一苦于寺内用水困难，一日见两禽争斗，十分好奇，以杖拄地，顿时泉水涌出，故而在唐开元元年(713)更寺名为“圣泉寺”。蔡襄《游圣泉》诗曰：“源流出何山，涌注知有异。”自注：“俗传泉涌则民安，是泉涸十余年，今始涌也。”以圣泉寺为中心方圆百里，西至东庵里，北至大乘寺遗址，南至东半栏都属于寺院。周围还有大乘爱同寺、虞公庵等“九庵十八寺”。在东半栏南面立着一块石碑，三莫谷(大乘寺遗址)背面立着三条石柱，从这些遗址遗迹可以看出当年寺庙的规模宏大。圣泉寺大雄宝殿面朝正南，院堂前立有两座明万历年间造的石塔，叫多宝塔，其须弥座周长4.56米，塔刹尖顶，七层八角实心，花岗岩建筑。塔身每面雕有佛像，每尊佛像两侧刻有佛名及施主姓名。须弥座刻有圈纹图案，并镌刻有建造年间：“大明万历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吉日立……”据林枫《榕城考古略》记载：“寺有唐李邕《怀道塔碑》、皇甫政《怀一塔碑》，又有文殊岩、多宝塔、天台井、放生池、神移泉、灵芝坞、蛰龙轩、涵虚沼、御书堂诸胜，今多颓废。”寺中有“六奇”：分别是道一二师碑、天降舍利、松不栖禽、梁不巢燕、池不生蛙、庭不生凡草。唐侍御刘轲曾作《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略云：“天下精刹往往称闽州胜绝。有东山法华院，为东南(法)窟之一。景龙初有神僧怀道，始卜于爱同之西，卓一泉腾涌喷出，两道分注，一注濯所，一流为池。乃记讖曰：缩去离乱，涌来太平，邻寺有泉，此泉不灵。继有怀一居之。一之后智常



圣泉双塔

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重修大雄宝殿，还原圣泉古井。

古代，出福州东门经塔头街、菜园口、三角池、溪口、上墩、李园、蒲岭、潭下、园墩、东山、上古、樟林、麻院……有一条宽约1.7米，用石板铺成、依山傍水的东郊古道，供商贾、行人通往马尾、闽东各地。过横屿石桥，在园墩（园中）转一个弯，沿狮子峰西侧绕山迂回而上。上山的一段古栈道称为“三十六弯”，始建于宋熙宁二年（1069），完成于熙宁九年。从南朝至唐宋期间，这条古道旁是福州通往京城的一官道。

圣泉寺边上的鹿溪（现名可溪）就发源于狮子峰下“三十六弯”北端佛顶角。佛顶角是狮子峰北侧的一座山峰，常常有光环出现，因此而得名，与“狮子峰”两景合之，称为“雄狮拜佛”。鹿溪流水潺潺，一缕清泉喷珠溅玉，水流经过北庙，作为农家水碓的动力，涓涓细流的十里清水，顺流而下，在樟林村附近与鱔溪合并为磨洋河，灌溉下游田亩，在远东村汇入光明港，流入闽江。鹿溪内有一潭称为龙首涧，《三山志》记载：“龙首涧，许状元将肄业之所。治平丁未知县陈清刻石，榜书“龙首涧惟有读书堂”。狮子峰附近除了前述的榴花洞，还有铁鼎潭、观澜亭、玉溪堂、夜光台、神僧室、鉴净轩、清音亭、山辉堂、碧岩亭等名胜。今鹿溪、鱔溪下游，在东山新苑附近还留有龙溪境、狮峰境、狮峰路、双溪路等地名。

宋代很多名臣将相都不惜笔墨来歌咏东山狮子峰一带的山色美景。福州郡守张劝有《山辉堂》诗写东山有胜景：“肃肃松竹荫华扉，更有虚堂隐翠微。云掩峰峦横秀色，月低岩谷弄清辉。分开远碧鸣泉落，点破寒光白鸟飞。还似山阴秋霁后，照人怀抱欲忘归。”

张劝是永泰嵩口月洲第七代孙、进士张肩孟（1017—1089）的第四个儿子，字宏道，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张肩孟生五子，均为官，时人称为“丹桂五枝芳”。大儿子张劬，字深道，终中大夫。最小的儿子即张元幹的父亲张动，字安道，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诗人。

几乎与黄裳、张劝同朝的宋状元许将（1037—1111）则有诗赞碧岩亭，狮子峰碧岩亭和龙首涧一样是许将的读书处。《碧岩亭》诗曰：“旧室僧留古岸边，欣予同赏碧岩前。日生狮子峰头树，烟伴榴花洞口泉。黄叶入秋山出地，白云临晓海垂天。飘然踪迹今何在，别去江山又一年。”

还有一首是《游东山和程大卿师孟》：“东山十里复溪流，远客时时骋望愁。泉近榴花深涧口，亭开狮子旧峰头。一州旂色天边出，三馆芸香海上留。南北共歌公所憩，独嗟无计共英游。”

据《高阳许氏入闽世谱》记载，许将的五世祖籍闽清坂东镇文定，高祖时迁城门外虎园居住，其父许仲奕曾一度居福州琼河水部置浦巷、状元境一带，娶沈氏夫人，生三子：将、时、特。（福州在唐天宝年间改为长乐郡，乾元元年（758）复名福州都督府，治所在闽县，所以许将自称长乐郡人）。北宋嘉祐八年（1063），许将中癸卯科状元，年仅26岁，是历史上福州地区第一个状元。欧阳修读其赋，谓曰：“君辞气似沂公，未可量也。”许将文武双全，廉洁奉公，深受神宗、哲宗器重，曾担任明州通判、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龙图阁待制等职。政和元年逝世，享年75岁。宋徽宗赐御书墓表，葬长乐梅花镇。明洪武年间，因筑建梅花城，其后代把许将的墓迁到福州新店镇涧田村（桂后溪源头）。

许将未第时曾借读于闽清七都积善寺（今塔庄镇秀环村），留有《别师》诗云：“为爱山居乐，山居转忆家。菊黄来日蕊，梅白去时花。水阔离情剧，霜晴别路赊。前途回首望，遥指暮天霞。”离积善寺不算很远的永泰大洋镇名山室是福州地区重要风景名胜之一，也是当年许将常往之地。许将曾为石室题联：“石室云开，睹大地山河三千世界；水帘风卷，露半天楼阁十二栏杆。”另题石门诗云：“上得山来叩石门，谒灵特地乞真言。再三许我前程事，敢不留题谢圣恩。”此诗后被永泰一县令抄录刻于入山石门侧，保留至今。

宋代爱国名臣李纲(1083—1140)曾到东山拜访许将，作诗《次初访许子大龙图于东山大乘寺留饮观荔支》：“物外仙家长自春，隐沦何必为逃秦。只应榴洞赠花者，便是桃源种树人。丹荔枝头星灿烂，白云峰顶玉嶙峋。主公留客非无意，端为出山多世尘。”此诗应作于1102年至1111年之间，李纲与许将相差46岁，此时李纲还未中进士，作为晚辈来拜访受贬归隐的状元郎。李纲后来曾提起许将，景仰之情溢于言表：“文定许公，当仁宗嘉祐中廷对，为天下第一。历事五朝，逾四十载，入位丞弼，出拥节旄，其勋业、行义、经术、文章皆兼备之，为当世之所瞻仰。”

许将次子许恒中武状元。八子许份崇宁二年(1103)登进士甲科，宋徽宗对许份十分赏识，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国史编修官，龙图阁学士。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许将曾孙许应龙嘉定元年(1208)举进士，调汀州教授，屡迁为籍田令。擅诗，著有《东涧集》14卷、《四库总目》传世。这就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两状元两进士，许将家族是狮子峰的骄傲，也福州人的骄傲！

东山狮子峰不仅是宋朝状元、中书侍郎许将的读书处，也是宰相蔡襄、曾巩、李纲、李弥逊等名宦、文人吟咏题诗的胜地。宋朝诗人王汝舟，字公济，晚号云溪翁，婺源武口（今江西婺源）人，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是许将好友，常聚狮子峰下龙首涧吟诗作对。元末邓定，明陈亮、谢肇淛、徐渤、林世吉都曾到访东山狮子峰。狮子峰还有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近代高僧圆瑛大师存留的古迹。

狮子峰附近还分布着许应龙、姚勉、钟耆德、许天锡、韩准、林渭、林采的墓地。明中叶，许天锡（字洞江）为弹劾贪官刘瑾“尸谏”。后诏赐祭葬，大书墓碣：“赐一品祭葬洞江许公之墓”。东山榴花洞口西壁有许天锡御葬山界榜书题刻。

乾隆《福州府志》记载：“虞公庵，虞常侍寄隐处。”虞寄，字次安，号东山居士，是南朝陈时代的会稽余姚人，“弱冠举秀才，对策高第，梁大同中尝上《瑞雨颂》，武帝称美”。称“江南才子”。唐代名臣、大书法家虞世南就是

其兄虞荔过继给他的儿子。

公元557年，陈霸先灭梁建立陈朝，称陈文帝，向陈宝应讨还虞寄，还把陈宝应编入宗室，任其为闽州刺史。但陈宝应拟配合其岳父、缙州刺史留异反叛朝廷，留住虞寄不还。虞寄只好在福州呆了7年。他先是劝陈宝应服从陈霸先的陈朝中央政权，以免兵革涂炭人民。陈宝应暂时答应了，但心里另有他谋。虞寄知道陈宝应不会听自己的话，便躲到东山大乘寺旁结茅隐居。《三山志》详载了这件事：“陈宝应谋不轨，虞寄屡谏不听，遂隐。”陈天嘉二年（561），陈宝应果然举兵反叛中央，派差官来请虞寄出山议事。虞寄坚决婉拒。“宝应怒，遣人焚其舍，寄安卧不动，纵火者为灭其炬”。

天嘉四年，陈文帝派人举兵讨闽，陈宝应大败，星夜逃到莆田，想起虞寄的劝谏，颇为后悔，说：“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后被执送建康，斩于市”，身边的20多人也一起问斩。只有虞寄独善其身，得以幸免并回到建康，还被授建安王咨议，直到陈太建年间（569—582）才无疾而终。当地百姓崇尚虞寄为了真理视死如归的精神，把他住的茅屋修成了“虞公庵”，让人凭吊。

宋熙宁十年，福州太守曾巩曾来虞公庵，写了一首诗：“虞寄庵前薛径通，满山台殿出青红，难逢堆案文书少，偶见凭栏笑语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黄微破日边风。从今准拟频行乐，日伴樽前白发翁。”“满山台殿”写出了宋时虞公庵规模之宏伟壮观。可惜到了明末，虞公庵荒废了。徐渤曾凭吊过虞公庵，并写一首诗：“一片空心草木疏，欲寻遗地但荒墟。野翁不识前朝事，犹记当年旧隐居。”清代，乡民集资重建了虞公庵，但规模大不如前，仅是一座四架椽的小庙。清代台湾诗人陈肇兴有诗《虞公庵》：“一卧东山寺，千年姓氏留。相韩卑蒯彻，尊汉重班彪。烈火终难动，高风孰与俦！南丰凭吊处，台殿已芳邱。”赞美虞寄的高风亮节。

虞公庵现在虽然已无从寻觅了，但东山狮子峰的名士风流不应随着东山村和园中村的拆迁而逝去，东山村真是一个遗落的历史文化名村。

寻访拔仕官路

◇叶 红

因为工作的关系，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福州的地情文献。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章节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地方——“拔仕（别仕）官路”，它激发了我的浓厚兴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我和好友踏上了寻古探幽的美好旅程。

拔仕官路位于今闽侯县荆溪镇关西村拔仕自然村。它是福瓯古驿道中的一段。福瓯路是福延路未拓通前福州连结闽北的唯一陆上交通线。据《福建史稿》载，汉元封元年，汉武帝进攻闽越，东越王余善在闽西北筑6城拒汉，但在汉军攻势面前，节节败退，6城陷落，退回冶都，其败退线路正是福瓯路。

这条官路始建于汉代，唐代福延路修成后，逐渐冷落，但仍是著名用兵之道。唐乾符五年（878），黄巢农民起义军从仙霞岭入闽后，就沿此路攻入福州。宋时，曾一度废福延路用福瓯路。现在拔仕官路尚存的遗迹可以佐证。

步入古道，脚步似乎变得轻快起来。在城里还觉得暑热难当，此时只感到凉意四起。这儿古木参天，幽壑林泉，百鸟翔集，一切都仿佛律动着永不沉溺的生命。这条路绵延约3公里，每一片景都是牵动心弦的另一重天。

最喜欢的还是这里的静。行人很少，人语很轻，鸟声很浓。人和路都是十分的体贴，路俨然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连蝴蝶也似乎变得安静了，色彩斑斓的蝴蝶仿佛穿上了隐身衣，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不动声色地将夏日午后明媚的阳光，扇成了熠熠的五色光芒。

在这条古道上，有三处石刻，都与官路有关：一是“拔仕”榜书，二是《募修官路记》碑，三是《修沙溪路记》碑。

引起我极大关注的是那块《修沙溪路记》碑，碑铭刻于宋嘉祐三年（1058）。石碑宽2.6米，高2.46米。碑文详细记述了北宋年间怀安县城，自沙溪口，过拔仕岭、新蓝至鸡菜岭，约有百里之远，“路险石恶”“行人苦之”的状况和怀安县令樊纪上任第二年就修通这条拔仕官路的宦绩，并寄望于“继政君子”像樊纪一样，做到道路“缺者能补，陷者能平，断者能接”。

我的目光长久地在这些文字中摩挲，手轻轻伏在那苍劲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间，感受时间的厚度。我相信，每一个到此凭吊寻访的人，都会和我一样，长久地在这块碑石前伫立凝思，情寄高茫。就像班固在《西都赋》里说的：“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众所周知，福建地处丘陵地带，道路多依山势修建，上下低昂，盘行陡峻，故古人有“蜀道无以过”的感叹。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碑文中写到的“鬻于旁而啄衣者，牙于中而啮足者，蹲于前而梗步者”是怎样一种情形了。陆机说：“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穿越厚重的历史烟云，我们可以想象，古道西风，车马辚辚，那一路风尘的驿卒、进京赶考的举子、负重前行的商旅，他们的前路是怎样的艰辛坎坷。由此想来，怀安县令樊纪“因购工力，率皆琢去，易艰涩为平易。虽引杖索涂者，亦无颠踣之虞”，其作为可谓功德无量！

这条官路修通以后，曾一度喧嚣和繁华。它不仅方便了百姓自由出入，往来的商旅也是络绎不绝。同时，它还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驿站。宋梁克家《三山志》称：“福州南至莆田，北抵永嘉，西达延平，由南以往凡五驿十铺，由北以往经十一驿，由西往驿四铺十三。”拔仕（别仕）旧隶属侯官，宋太平兴国六年（981）至明万历八年（1580）置怀安县，这里又隶属怀安，为古时关源里三十六墩之一，为宋代福州西门外出省官路的首站驿铺，其地位不可小觑。

关于樊纪，史志上并没有太多记载。《侯官县乡土志》有关他的介绍只有零星的片段，《三山志》和《闽都记》关于他的文字也只有寥寥数笔。但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樊纪”这个名字，多数时候，是与一条路、一座桥、一个庄寨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他带领官民修通的这条拔仕官路，他建造的琴亭桥，他修葺的降虎寨古道，等等，等等。

据载，樊纪任职期间，组织和募捐修建、铺设和维护的大小道路、桥梁不下百处，为民办的实事、好事难计其数。《龙文王庙记》曾记载，当地“千百年来，百里之外以水旱凶扼”，县境内有一座龙文王庙，祈雨最为灵验。樊纪多次到此为民祈雨求福，祈求上苍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拳拳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所以，《八闽通志》中的“名宦志”择其载入史册。由此看来，官声名誉不在于居位高低，光芒喷薄不在于

时间局限。民心就是最公正的一杆秤。

在这条古道上，还有一块碑石——《募修官路记》碑，也一定不能忽视。它南距《修沙溪路记》碑约30米。碑高1.52米，宽1.43米，碑文写道：“都劝首林慈，发心起首铺境内官路，每丈管钱一贯四百文，并募缘舍钱姓名于右，……宣和元年岁次己亥（1119）劝首林简立碑。”此碑主要记录林慈发动村民修建“首铺”“官路”的捐资情况，他的儿子林简在路边岩壁上刻碑留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乐善好施、同心协力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美德。在这篇碑记里，我看到这一美德又一次得到了完整的诠释和彰显。

这两块碑石树立的时间前后相差61年，但似乎没有丝毫的距离感。仿佛是心心相印的挚友，它们因为一条路而结缘，千百年的风中雨中，时时相互颌首致意。官葺民修，官民同心，共同指向了民生福祉。这一条路，因为赋予了这一层不同寻常的意义，而显得更加坚实笃定。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如今，这条穿越千年的沧桑古道，就这样安静地蛰伏在大山深处，难显往日的光华。尽管碑前的芳草年年翻绿，总还是当初的颜色，周遭的树木却已经长得又高又大了。时光是无情的砂轮，而世界却日日更新。当高速公路碾过曾经的车辙，飞机的羽翼划破新世纪的曙光，把东西南北的世界串成了一个“地球村”，我知道，这条路已离我们好好好远。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不希望它被我们彻底遗忘。我相信，未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美丽乡村游的线路一定会延伸到这里。到那时，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俯身拾起一段溢满浓浓乡愁的历史记忆。也会有更多的人，面对着那块碑石默默沉思：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像樊纪一样，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对国家和社会自觉地肩负起应有的担当？一个人又应该如何逐渐抛弃卑俗和琐碎，走向宽广和辽阔，通往远方的世界？

也许，到那时，我还会再来。

林寿图书院教育一二事

◇陈常飞

福州致用书院，从成立到停办，前后仅三十年左右，然其对福建文化与学术的影响却很深远。它以研究经史为目的，本着“通经致用”的宗旨，为社会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书院历任主讲仅有林寿图、郑世恭、谢章铤、陈宝璐（代）4人。

首任山长林寿图，系清代名宦，曾任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山西布政使等职，为官清廉公正，不畏强权，故廉名远播，雅负时望，“历官四十年，所至有声”（谢章铤语）。他器识宏深，德性纯正，且能诗善书，“其诗工且多，一时魁人杰士无不怵服而钦佩之”（林寿图《黄鹄山人诗初钞·谢章铤序》）。林寿图交游甚广，常与刘存仁，王拯、孙衣言、谢章铤等宴游酬唱，还与沈葆楨、曾国藩等谈论国家政事。今利用所见史料，将其生平事迹及教育思想略述于下。

林寿图（1809—1885），原名英奇，字恭三、又字颖叔，晚号黄鹄山人、欧斋。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家居衣锦坊。祖父林元炳，乾隆年间举人，官江宁府督粮同知，著有《桐花轩吟稿》。父林士燧，性孝友，因侍奉母亲未曾应举。母张氏，“通经知文章，系出宋儒南轩（张栻）先生”。林寿图幼年丧父，家庭窘迫贫寒，“饥则拾野田弃蔬以食，寒则乞谷皮爇以取暖”。即使如此，也无废课读。其母张氏茹苦含辛，督其读书，“残书数卷，一灯如黍”。（谢章铤《大清赐封一品夫人太夫人张氏墓志铭》）林寿图后来回忆说：“先太夫人之教寿图也，母而兼师，授《论语》，口占云：‘入学志读书，书亦无多字。有若似圣人，孝悌根本备。卜子为经师，君亲身力致。时习即习此，三章通一义。’及学作文，又口占示之云：‘之乎者也矣焉哉，必要用心去学来。此字文中不可少，欲求端要自童孩。’”（林寿图《榕荫谈屑剩稿》）逮林寿图步入仕途后，张氏更告以为官之道。

林寿图天资颖异，“性聪敏，读书十行并下，髫龄出语已惊长老”（刘存仁《笃旧集》）。后自学诗歌，名重乡里，深受闽县令曹怀璞器重。“青年时期的林寿图主要活动地域是在福州，除了读书求仕外，他还喜好结交诗友。”（陈晶晶《林寿图研究》）他曾与里中名流刘端、沈绍九、陈福嘉等人结社湖上，晴日雅集荷亭，各寄所适，畅怀吟咏。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作《舟夜对月怀西湖社诸友诗》长诗一首，其中有句曰：“我家别业西湖间，绿萝飞烟覆晴山。山空鸟啼月夜出，时有数子来扣关。”（《西湖志》卷5）诗篇后结

集为《西湖社诗录》。

未中举前，“林寿图靠做教书先生维持生计”（张根华《林寿图与清代福州致用书院》）。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年（1837-1840）间，他分别教学于琼水馆李氏园与郑氏园。因苦志力学，终于道光二十三年得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及第，官工部主事，时年37岁。

在京时，林寿图受到王庆云、曾国藩等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启发。咸丰二年（1852），考取军机章京，因其善作楷书，故担任帮办总章京，负责起草机要文书。之后历任方略馆收掌、纂修、协修等职。他博涉群书，务为经世之学，闲暇之时“则与孙衣言、邵懿辰、张寿图、金镛、王拯数子以学问相切劘，讲有用之书”（陈衍《近代诗钞》）。他曾上《求才务实》《求直言以光新政》《应诏陈言》等疏，分析时政，力陈当时官场弊病，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方法，深得慈禧器重。

同治二年（1863）九月，林寿图任陕西布政使。他目睹民生疾苦，百姓困顿，心中感慨，常作诗以鸣不平。他曾作《攫麦叹》诗曰：“十亩种地九亩荒，一亩割者青未黄。县官苦陈户逃籍，将吏怒说农登场。风追马蹄不相及，湿薪未燃灶火熄。健儿攫去麦三升，孙扶翁姥抱瓮泣。”任上，林寿图力纾民困，为百姓竭尽心力。治陕数年，颇有政声，时有民谣曰：“老林来，老林来，粥鼎开，食无灾。”（谢章铤《赏四品顶戴团练大臣前陕西山西布政使林公墓志铭》）当时关中书院遭兵灾殆毁，其母张氏语其曰：“而（尔）非肄业鳌峰、越山两书院，安得有今日，曷弗图诸故？”（谢章铤《大清赐封一品太夫人张氏墓志铭》），于是林寿图捐金修复。

同治九年，林母去世，林寿图回福州守制。时福建巡抚王凯泰，有志振兴闽学，于是依阮元创建的浙江诂经学舍和广东学海堂的规制，开始筹建致用书院。同治十三年，他延请林寿图为书院首任院长。

致用书院招收全省举人、贡生、生员等各级

学子，以“通经致用”为宗旨，课程以研究经史为主，期于培养明体达用之人才。林寿图主致用书院讲习时，常与谢章铤、刘存仁等切磋经义，纵论一切，三人促膝长谈，每至夜半。谢章铤为其作墓志铭时，回忆这段往事说：“子夜，予倦而息，炯甫（刘存仁）健，与公酬对，辄至鸡三号。”

何振岱《西湖志》（卷19）中“《西湖书院学约》一卷，清闽县林寿图辑，见《致用堂志略》”一条，可知《致用堂规约》即其所编辑。

“规约”即学规，也作学约、规训、学则等，是书院教育的纲领，体现办学宗旨，为诸生树立治学方向，确定进取目标。林寿图参酌大儒陈寿祺《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中“正心术、稽学业、择经籍、严课规”几条内容，又损益吴崧甫的《两浙校士录》中“经学不可不明、小学不可不讲、史学不可不广、文学不可不富”等内容将之定为《致用堂规约》。这则学规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与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林寿图还为书院题匾、撰联。在书院“枕经蒹斋”中，他书写自撰联曰：“博学虽未能，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期与诸君共勉；格物于何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推之天下可平。”（王凯泰《致用堂志略》）楹联化用《中庸》和《大学》两部书中的经典名句，亲切指点书院学生，并寄予厚望。

藏书是书院“三大事业”之一，书院藏书乃师生讲习之所资，历代书院山长多重视购置书籍，他们利用这些藏书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林寿图十分关心致用书院藏书，据史料记载，他曾捐赠140多种藏书予致用书院，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经学”方面有《皇清经解》《周官义疏》《春秋诸家解》等书；“小学”方面的如《说文通训定声》《说文提要》等书；“史学”方面的如《西汉年纪》《旧唐书》《明史》等书；“诸子学”方面的如《抱朴子》《晏子春秋》《墨子》《列子》等书；还有如《梁溪全集》《黄漳浦全集》《陈恭甫左海全集》等名家文集类书以及《搜神记》《述异记》

《博物志》等古代志怪小说集。

在文学创作上，林寿图讲求“精神寄托”，认为“文章道所寄，精神不俱尽”（林寿图《再叠山谷韵送炯甫归闽并题其岷云楼集》），主张文以载道，发挥教化作用。

他认为一个人有才气天分，还须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说：“才气有余，学殖或不足，使天假以年，安能量其所至。”并劝告人要“慎择师友”，说：“学问要有渊源，师友最宜慎择。观摩渐渍，有不自知者。”（林寿图《榕荫谈屑剩稿》）肄业诸生在其指导下，获益良多。

林寿图知识渊博，品正学纯，主讲致用书院虽仅两年时间，而对致用书院日后的发展及闽省教育的影响却很大，时人将他比作名儒钱大昕与卢文弨。福建近代文史学家、教育家陈遵统评价说：“当时致用书院新设，久困八股文试帖窠臼的士流，忽然隶籍在这新式的书院中，又遇着这贯通各学、诗文都足自名一家的山长，于是有疑便问，寿图也有问便答，使他们枵腹而来，满载而去，因而研究的风气极盛，学术界蒸蒸日上，欣欣向荣。”（陈遵统《福建编年史·第四编》）

另值一提的是，当时福建巡抚王凯泰以“脱粟饭”饷寿图，并以薯叶为羹。林食而美之，并仿其制法，雅称“中丞菜”，用以遍饫致用堂诸生，又以此为主题向他们征诗，此事在当时福州传为趣谈。从这则资料中可见林寿图与学生们的情谊，及他在教学上善于利用身边事物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方法。

光绪二年（1876），林寿图守制期满，释服入都，补官山西布政使。当时山西旱荒，人劝其投劾自免，林寿图闻言曰：“能乎？忍乎？”然而终遭弹劾革职。及行，山西百姓相送如云。随后前往湖北，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楨，聘其主讲江宁（今属江苏南京）钟山书院，光绪七年回闽。光绪十年，中法马江海战爆发，海军败绩，“省会大恐，朝命办团，以寿图为团练大臣，赏给四品顶戴”。（陈衍《闽侯县志·林寿图传》）后

中法议和，奉旨送部引荐，寿图因病不赴。

光绪十一年，林寿图与世长辞，得寿77岁。生前自营生圻于福州西湖贵安山，并手书墓门曰：“未知东越归何传，为爱西湖买此山。”（民国《西湖志》卷十五）

林寿图能文工诗，并擅长书法，雅好绘事。他曾登上福州乌山，驻足李阳冰篆书崖刻前，注目其字迹，心摹手追，并想象李氏挥毫神态，用“长楸飞鞚骥渴”句来说明他下笔毫不迟疑，书写技巧的娴熟。并留句感叹曰：“苔织薛绣白斑斓，雨淋日炙增坚黝。我初似观碧落碑，下马布毡坐忘久。”（林寿图《登般若台摹李阳冰篆》）这是他读碑后的感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书法艺术的投入。他还曾对南唐董源，元代赵孟頫，明代唐寅、沈周、仇英，及清代恽南田、王翬、王原祁等著名画家的作品进行品鉴，并吟诗题画。林寿图“偶亦作画”（林家溱的《闽画记》），在书院讲学期间，有琉球人登门求教，因此其“书画、诗文多流入琉球国”。（季啸凤《中国书院辞典》第468页）虽然林寿图并不专精于翰墨丹青，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的文化修养。

林寿图生平为读书而藏书，尤多善本。他曾珍藏一张欧阳修滁州画像，常悲叹自己的身世与欧阳修相类。他一来仰慕欧阳修的学问人品，二则表示不忘母教，于是将书室命名为“欧斋”。林寿图一生染翰操觚，利用藏书填补了中华学术史上的某些空白，值得我们深深敬畏。他著有《春秋浅说》、《论语证故》、《经余赘记》、《两晋六朝类纂》、《冶南诗藪》、《诗经注释》、《尔雅补注》、《闽学宗派考》、《黄鹤山人文集》、《欧斋书画记》、《榕荫谈屑》（一卷）、《启东录》（六卷）、《黄鹤山人诗钞》（十八卷）、《华山游草》等。并辑有《西湖书院学约》（一卷）、《西湖社诗录》（二卷）、《西湖冶春词》（一卷）（与郭柏荫、黄绍芳等人合作）。可惜后来因书楼失火，藏书被毁，生前手稿也焚烧殆尽，令人扼腕喟叹。

客居台湾福州人抗日团体 及忠贞人士谱

◇郑宗乾

福州人历来有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史上每有外人入侵时，总是以我乡先贤民族英雄林公则徐为榜样，挺身而出捍卫我们民族与国家的尊严，乃至以身殉国，杀身成仁。1931年“9.18”事变后，反日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中华儿女更是摩拳擦掌，纷纷拿起武器与侵略者抗争到底。此时旅居在远离祖国大地，孤悬海外台湾岛上的福州人，无惧日本殖民者的淫威，在“台湾中华总会馆”及各地分会馆领导下，先是动员组织在台内大陆人返回祖国参加抗战。1938年1月21日《江声报》报道：“福州十九日电，旅台华侨（即不愿加入日本籍的在台大陆人）自全面抗战后，陆续归国者达四万余人。”其中不少福州人安顿好妻儿回故乡避难，自己却留在台湾，想方设法收集敌情，捣乱其后方，为国效力。

继而组建抗日团队。最具代表性人物是闽侯县上街乡人陈发梨，时任台湾中华总会馆主席团主席，率先秘密组建“抗日救国团”，自任团长。（《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台湾知识词典》均有“抗日救国团”词条）。后因在台大陆人大批集中返国，导致日本警宪警觉，大肆抓捕中华会馆干部、会员。《台湾知识词典》以“华侨事件”为词条，释曰：“全岛中华会馆及直属

支部30余处的干部、代表均遭逮捕，人数达三百余人。”陈发梨于1937年12月5日被捕入狱，“台湾中华会馆”及“抗日救国团”遭到严重破坏，然在台福州乡亲抗日之志未曾泯灭。“台湾三山善社”（系由在台湾谋生的福州、闽侯、长乐、连江四地的福州人组建的慈善机构，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负责人黄守达和林学盛、郭尚清等干部，认为要继承台湾中华会馆、抗日救国团未了之志，再接再厉共赴国难，议决于1938年2月1日秘密组成“三山抗日会”，以“福首”为干部，“社员”为委员，充分利用和发挥“善社”各种有利条件，团结旅台福州乡亲、深入日方组织，搜集军事情报，见机行事，扰乱其后方，配合内地抗日，争取胜利光复台湾。

客居台湾的福州人，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十余年中，在敌国直接管辖下的台湾无法得到政府支持和乡亲们的声援，在特殊环境下不畏艰险不惧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始终坚持反日抗日斗争。以下所录忠贞人士谱，其事迹可歌可泣，读之催人泪下，肃然起敬！

1. 陈发梨（一作发斐），闽侯上街人。出身农家，幼年失父，为减轻母亲负担，抚养弟妹，15岁只身赴台，被台北市大稻埕一家乡亲开的金饰店收为佣工。因为人平实、勤劳又求上进，深

受雇主怜爱，允其闲时学艺，并将自身技艺传授无遗。他不负所望，不数年凡首饰行业中高难度的镶、嵌、镂等技术，一一学会且青出于蓝，名噪一时，身份由佣工为学徒为伙友直至自立门户成为店东。富有后的陈发梨，益发助人为乐，慷慨解囊。同时还极其关注乡亲们社会地位低下的“华侨”身份，以及被歧视的险恶生活处境，出钱出力，发起组建“华侨俱乐部”，以排遣乡亲们的孤独和烦闷。过不久，发觉俱乐部毕竟是俱乐部，无法与当局沟通、交涉，遂与志同道合者商议创建“中华会馆”。1923年10月10日，“台北市中华会馆”正式成立，自此大凡遇有不公事端，便以会馆名义出面交涉，“侨民”合法权益多少得到改善。

台北市中华会馆的成立，在全岛影响颇大，台中、高雄、嘉义、基隆、宜兰、彰化等地，相继成立了“中华会馆”。然各自为政，影响力有限。再商议在保留各地“中华会馆”的基础上，筹建“台湾中华总会馆”，以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影响力。1927年3月10日，“全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市举行，宣告“台湾中华总会馆”成立。此后每年都举行一次代表大会，除研讨工作外，就是换届选举新领导人。陈发梨于1934年1月7日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该会主席团主席，并在第八次、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连选连任主席团主席。

陈发梨素有爱国心、中华情，且颇有政治家胸怀。长期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担心乡亲们尤其青少年数典忘祖，于是出资出力兴办“中华学校”补习班，夜校等。延续中华文脉，1927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建都南京宣言》，消息传来，陈发梨兴奋不已，立刻制作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悬挂自家商号上，并要求已加入中华会馆的会员一律遵行。日本警宪见状干预阻止。他面对蛮横的日本宪警，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中国‘侨民’，难道不能张挂自己国家国旗吗？”宪警无言以对，只好作罢，可陈发梨从此被定格为“危险人物”。

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陈发梨敏锐意识到中日难免一战，敌强我

弱，我辈要众志成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与敌斗争到底。于是假借“开发海南岛”名义，募集钱款，转汇内地支援政府抗日。“卢沟桥事变”后，陈发梨即把妻小送回老家，只身留在台湾，全身心投入反日抗日，秘密组建“抗日救国团”，自任团长，决心以身殉国。不幸果于1937年12月5日被捕，日寇先是以利诱其组织亲日团体遭拒，继之种种酷刑加身，他坚贞不屈。陈发梨在狱两年，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于1939年10月5日被释放，归家仅两日便亡故。乡亲们悲痛交集。送殡当日，300余人义愤填膺，边走边哭，“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到喉咙强抑住了，因为日本警宪真枪实弹跟随监视。消息传到福州，党政军各机关联合，于是年12月17日举行追悼陈发梨先生大会。笔者有幸在省档案馆无意中发现当年追悼会照片（见图）。

又在省图书馆查到1939年12月18日《福建民报》有关追悼会新闻报道，始知当日追悼会主祭人话才说一半，警报响起，台上台下500余人镇定自如，真至敌机临空始疏散躲避，表现了福州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概，读之倍感悲壮！民国32年（1943）年6月15日，民国政府以仁陆字13462号发布褒扬令：“闽侯旅台湾侨民陈发梨，民国十二年首创中华会馆于台北，团结侨民，效忠祖国抗战，以后志行不渝，被囚两年，卒遭毒害，峻节既昭于东海，流风无忝乎义门，应予褒扬，以旌贞善。此令。”《罗星塔》月刊116期著文《陈发梨写下抗日英勇史》追念。

2. 盛雪侖，福州人。1922年，盛君正值青年，东渡台湾，在台南开设“兴文斋”墨店。因仅此一家，又善经营，一路顺风，颇有成就。一度离台返乡，民国23年（1934）再度来台，在台北永乐町重启“兴文斋”墨业，生意依然兴隆。盛君热心肠，对在台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同乡，不管认识与否，只要开口都给支助，可谓“有求必应”，因而深得乡亲们拥戴。也因此引起日警监视。1941年11月被囚禁，受毒刑虐待年余，奄奄一息垂死之际释放，次日便逝于家中，时年51岁。遗下在台北博爱路146号的“兴文斋”，由

其子高宇经营。

3. 郭尚清，生于民前18年，福州塘池乡人，武备出身，性格纯厚，生活简朴，对慈善事业极为热心，在台北新起町（今长沙街）开设“尚清”五金工厂。“9·18”事变及“1·28”上海事变，日本野心昭然若揭。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借三山善社和中华总会馆名义，与陈宝源合作，吸纳同志搜集敌人情报，暗中进行抗日救国工作。不幸于1942年10月27日被台北州外事课刑警抓捕，数度更换拘留所，严刑逼供，坚不吐实，终被折磨致死并沉尸灭迹，家人无处觅其遗骸。在狱期间，不允许家属探视，且不断勒索，钱财被掠夺一空。1967年3月，台湾有关部门以民字第230117号对郭君发布褒扬令。

4. 何云登，福州人。原业角梳，赴台后改行，创制皮鞋模型，商务渐入佳境，经济亦趋丰厚。他热心于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举凡同乡间喜丧事或遇各种困难灾患，何君总是带头帮助，且一帮到底，大有侠义之风，被乡亲视为中心人物。日人视其为危险分子，中日战争刚爆发便被抓捕，囚禁两周。1943年，又被捕入狱，酷刑下毙于牢狱，时年55岁。财产也被掠夺一空。留在台北太平町环河北街215号梧桐鞋模工厂，由遗孀何二嫂重振旗鼓。

5. 钱潭潭，福州人。1914年，年仅20岁便同兄来到台北，在三重开“钱滔记”铁工店。事业有成后，于1921年回乡完婚，并携妻柳氏来台，仍就铁工业。钱君生平富于情感，待人接物至诚。同乡有困难或灾难，一定热忱相助，颇得人心。1942年7月，以“支那间谍”案，被台北州日警田昭太郎等抓捕，押禁士林。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太太柳氏，儿子少熊、少华，及朋友庄依妹、雷歌倂、郑依在、池金官。囚禁月余，于9月2日，钱君及朋友均被害死，刽子手狠毒至极！妻子免遭劫难，返家欲哭无泪。

6. 叶朝铨，福州人。1920年到台湾，年25岁，以肩挑面担谋生。经三四年艰苦经营小有成就，便在台北市日新町（今南京西路）开了“小春楼”小菜馆。热心肠，乐于助人，很得人心。

对于这样一个白手起家，勤奋又助人为乐的好人，日警却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1年10月，敌人终于下毒手，将叶君及其女儿宝珠、妻兄黄斯模抓捕入狱。经受半年苦刑，惨死狱中。女儿免遭一劫生还。

7. 郑寿豪，福州人。1941年来台，时年19岁，在台北太平町（今延平北路25号北门口）开“天工社”绣补店。生意很好，又卖力勤俭过日子。为人诚恳忠厚，善于调解同乡之间矛盾冲突，声望很高。就这样成为敌人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10月27日被捕入狱。近4年牢狱生活尚存一息，熬不到鬼子投降，于1945年6月19日惨死狱中。

8. 方幼祥，福州人。生于民前8年，抗战前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三丁目开了一家“方仁记”牙刷店。育有两男两女，一家6口，日子过得安详。为人善良，所有慈善事业无不参与，乡亲有所求必尽力援助。早年参加中华会馆及三山善社，抗战开始参加抗日救国团。1943年7月30日，侵略者末日将临，疯狂抓人滥捕，方君被抓捕入狱，严刑拷打，三天两头接二连三，终于在是年12月4日惨死狱中，年方39岁。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台湾有关部门于1966年12月21日，以台内民字第220003号对其发出褒扬令。

9. 陈天明，福州人。民初来台经商，已历30年，事业有成，助人为乐，深有人望。他的命运与方君幼祥一样，于1943年7月18日，以间谍罪名，被台北州北属昭田刑警逮捕。在狱2年又6个月，已是奄奄一息。此时已是1945年初，日寇行将灭亡却丧心病狂，释放陈君时强制注射两支含毒针剂，还在饭盒中添毒液，其凶残令人发指。陈君到家4小时即毒发惨死，年仅40岁。家产被敌掠光，商铺关闭。老父、妻儿生活无着，惨不忍睹。

10. 方传超，福州人。十余岁时来台学习理发，1928年29岁，在台北永乐町（今迪化街）开“新发明”理发店，收入颇丰。他是苦孩子出身，深怀恻隐之心，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乡亲给他“疏财重义”称号。参加台北市台湾中华会

馆，并被推为执行委员。1941年10月17日，被台北州刑警逮捕，入狱仅4个月便被活活打死，年仅37岁。遗下妻与年幼的三女一男，生活无着，靠乡亲资助勉强度日。

11. 潘依八，福州人。业木器，在台北市新起町二丁目42番地开“富士木器店”，生意尚可。面临末日的日寇，疯狂滥捕华人，潘依八于1943年7月18日被台北州日本刑警大村田沼拘捕，强迫承认是中国间谍。该警凶狠无比，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一日数度提审拷打。潘君遭受两年又八天的折磨，终于1945年7月25日惨死于狱中。人亡，家财亦被勒索掠夺一空，留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

12. 邹恶妹，在台业鱼丸生意，物美价廉受欢迎，收入颇佳。热心肠，乐于助人，反日抗日，很有号召力。1939年3月，以“中国间谍”罪被捕。如同地狱般的牢房，仅半年，就把一个壮年男子折磨成浑身青紫浮肿、血肉模糊、无法起居的人。垂危之际放了出来，到家次日便断气归天，年仅43岁。遗族住台北市延平区得胜里三邻。

13. 潘福莺，福州南港人，生于民前8年。在台业木工，为中华会馆会员，抗战军兴，协助侨民撤离台湾回国，并协助郭尚清联络各地抗日会。事泄，被捕，备受酷刑，在狱两年余生还。台湾光复后参加中华会馆青年团，协助政府接收，于1960年12月逝世（另一说被捕殉难）。获台湾“内政部”1966年12月21日台内民字第220003号褒扬令褒扬。

14. 王耀庭，据台北市三山善社80周年纪念特刊《抗战时期旅台福州忠贞人士事略》介绍，王耀庭：“为日警所捕而殉难。曾得内政部台内民字第7722号褒扬令。并已祀忠烈祠”。另一资料这样叙述：王耀庭（1889-1937），原籍福建晋江，毕业于曹江高小，国民党员。早年随父赴台经商，1927年加入中华总会馆，被推为常务委员。1931年“9·18”事变爆发，与革命同仁一起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致力于抗日革命，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被台北州外事课逮捕。严刑之下亦不屈服，后被押解至台南刑务所，惨遭

酷刑，殉难于狱中，时年48岁。

15. 易炳汗，为日警逮捕而殉难，获台湾“内政部”台内民字第0903号褒扬令褒扬。

16. 魏忠铨（1902-1945），福建林森（闽侯）县人，少年家境小康，后因父亲亡故，家道中落而辍学，转而学裁缝。为人忠直，有朝气，有魄力。1926年携眷赴台，在屏东今中正路开设洋裁缝店。1934年被选为中华会馆委员兼青年团组训组长，对推进会务发展不遗余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余金不丰，但支援祖国抗日则慷慨捐款，以致资金周转不灵，仍无怨无悔。抗日救国会成立后，担任总务组长，负责印刷及传递传单，从未失误。后被捕入狱，关押三年余，因伤重保外就医。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魏君积极协助政府办理接收工作，被日本浪人攻击，导致旧伤复发，不治而亡，年仅43岁。台湾有关部门明令褒奖并入祀其原籍忠烈祠。

17. 陈加田，福州人。1897年来到台湾，亲眼目睹台湾人民奋起抗争，反抗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也看到爱国人士被镇压的惨烈，更加深了对殖民者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他木工出身，读书不多，却深明大义，常仗义执言，深受乡亲爱戴。邻里间若有纷争，都找他调解摆平。1923年，首任驻台领事林昭南副领事袁家达抵达前夕，陈加田手提大锣边敲边喊，把消息告诉大家。到达当日，陈君手持自制长1.5丈，宽5尺大旗上街，千余侨民自发跟随，欢迎领事到来。这事自然引起殖民当局不满。1941年4月24日被捕，时年已75岁高龄。敌人问他：“福州被我们占领了，你不愿意吗？”陈君愤极，却冷冷地回答说：“你们东京被人占领，阁下会不会愿意呢？”敌人恼羞成怒，凶狠地猛踢一脚，陈加田自知无法逃脱魔爪，当天便将裤子撕成长条，上吊自尽。被救后，手铐脚镣加身，他以绝食抗争。被拘禁三个月后，于同年9月28日释放，见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寿过九秩，儿孙满堂，所居住的贵阳街某巷，因陈君深孚人望，该巷改称“加田巷”。

18. 黄守达，福州人。民国前即已来台，与叔在台北经营“太生仪”钟表业。林森先生来台

都下榻该店。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主持“台湾三山善社”，精心发展社务，服务在台乡亲。1939年10月，无端被日警逮捕，刑虐整一年，于1940年10月释放。

19. 叶云章，1920年，受旅台胞兄鼓动，弃农经商，从福州来到台湾，在台北新起町（今长沙街）开“叶云章”木器店。他为人忠厚，早年与陈天民、潘乐庆参加中华会馆，被选为执行委员。1944年9月19日被日警逮捕，逼迫承认为盟军间谍，坚贞不屈，敌人得不到口供，关押36天后释放。

20. 徐桂福，民初来台习五金工艺，历3年又3个月学成，后自立经营“徐长吉”刀剪五金店，事业有成，先后又开两家刀剪五金店。为人诚恳热情，喜结交邻里，1943年2月，同好友林宗章以“抗日名人”同时被捕，经受250天毒刑无供，与林君一起释放回家。

21. 石玉官，民初来台习缝制西装，历十年，由艺徒而师傅，再成老板，在淡水开了一家“福玉华”洋服店。25岁娶妻成家，参加台湾中华会馆，并被推选为淡水中华会馆主席团主席。1937年12月7日被捕入狱，受尽种种酷刑，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始获自由。

22. 张炳辉，民初来台，习皮鞋手艺，时年14岁。19岁那年，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开“新其昌”鞋店。5年后，店迁往淡水，改名“新奇昌”，并与志同道合者组建淡水中华会馆，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1939年12月3日被捕，酷刑逼供，咬牙坚忍，一年又七个月后获释。

23. 郭钦藩，福州人。18岁东渡台湾，在台北市一家洗染店做工。十年后，在千岁町（今罗斯福路）开洗衣店。1942年10月27日，被捕入狱，直到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才获自由。

24. 陈宝源，福州台屿乡人，1919年，他才13岁，即来台投靠叔父学习铁工机械。两年后返乡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活动。19岁时衔密令再次来台，参加伪“新民公会”以掩护抗日。1942年10月27日晨被捕

入狱，屡遭酷刑，数次昏死，坚不吐实。到日本投降后才出狱。被推为台湾中华总会馆青年团团长，积极协助政府接收，为军队、盟军作响导，被誉为“革命老人”。1966年12月21日，台湾有关部门以台内民字第220003号令予以褒扬。

25. 孙祥泰，福州柳桥乡人。于1929年7月来台，时年22岁。经友人介绍入台中日办的漆器所任技师，因不满日人歧视和压迫，离职到台北自营漆器店，业务蒸蒸日上，增设3个工场及贩卖部、批售部等，员工达百余人。热心肠，为乡亲们所赞誉。1943年7月1日以反日罪被捕，关押半个月，虽施刑数十次，均无任何口供，当月15日释放。1944年4月28日晨5时，十余名日警包围其居所，再次被捕。受刑年余，直至日本投降始获出狱。关押期间，工场、铺面关闭，员工中有林世藩、邱祖培、宋振起三人被日人毒刑打死，其他员工被迫逃散，财产也被掠夺一空。

26. 潘乐庆，福州人。25岁来台，在今长沙路开一家中山木器店。热衷乡事，急公好义，先后参加三山善社、中华会馆、抗日救国会。1943年7月18日被日警抓捕，要其承认交代参加盟军地下组织反日，坚不吐实，熬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如获自由。

27. 林家富，18岁来台，先与友人经营一家杂货店，有成后独立在今长沙街开松山木器店。爱国爱乡，人缘好。1943年被捕，受刑一年，移往法院又关押一年，至抗战胜利才出狱回家。

28. 陈良柳，15岁随戚来台从艺西装业。出师后在淡水自营“柳的欢美西装店”。参加淡水中华会馆，心向祖国。1938年12月5日，与石玉官、何万富同时被捕。在淡水受刑半年，后转台北刑务所关押3年，逼迫承认盟军间谍，宁死不屈。直至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始出狱回家。1948年，获“内政部”部长张厉生褒扬令。

29. 谢方在，福州人。15岁时随师傅来台习铜工，后在台北西宁南路自营“福本铜工店”。参加中华会馆及三山抗日会，并借海南岛垦殖公司招股及募集资金名义支援祖国。嗣以调查重要资源等。1943年7月，事泄被捕系狱数载，备受

惨刑，直至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始获自由，并参加中华会馆青年团，协助政府接收工作。1966年12月，台湾“内政部”部长徐庆钟为其签发褒扬令。

30. 王铭泉，福州南台人。身怀细木技艺，于1934年来台，在台北柳州街自营“铭田木器店”。参加中华会馆和抗日救国会。于1943年7月8日被捕，严刑逼供不为所屈，关押至日本投降始获自由，参加中华会馆青年团协助接收工作。并将店号改为“光华兴”，以示不忘中华。1966年12月21日，获台湾有关部门以台内民字第220003号令，予以褒扬。

31. 林鸿珠，13岁赴台随父学刺绣业，长大艺精，收入颇丰，好交友。1940年3月被捕，辗转于南署、士林、高雄、台南、嘉义各监狱，备受苛虐酷刑，因无任何口供，只得释放监视。1945年（一说1943年）4月再次被捕，仍得不到口供，直关押至抗战胜利才出狱。

32. 林行生，福州西门外人。15岁来台学铜业技艺，长大后在大同区仁和里开“同生”铜工厂。28岁时以参加抗日救国罪名逮捕入狱，关了一年又6个月，日警得不到任何口供，只好交保于1940年10月3日释放。

33. 张钱钱，19岁来台，在台北开“新兴”西装店。常与同乡联络交友，爱国爱乡。1939年1月4日，与同乡林潘镜同时被捕，重刑致左手折断，不屈于敌人淫威，得保外就医。

34. 林潘镜，12岁随叔父来台习洋服技艺，长成在淡水中正路开“新华兴”西装店。热心公益，参与爱国反日活动。1939年1月4日，与张钱钱同时被捕。酷刑之下，两膝、左手均骨折，得保外就医。1948年，获“内政部”部长张厉生褒扬令。

35. 周乐斌，福州南台鸭姆洲人。肄业于尚育中学。1934年赴台，从事裱褙业。一年后，由台北迁新竹，加入中华会馆，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从事抗日救国工作。1937年，抗战军兴，决心回国参军抗日。行时密存一本台湾详图拟献给国军，不幸被日警查获被逮捕，时为1937年8

月26日。在狱不足三个月，受刑50余次，死去活来十数次，形销骨立，奄奄一息。被送往爱爱寮医治，幸遇善心护士陈招娣精心护理27天，重现生的希望，但还不能下床，又被拘押到南署。伤情又趋危急，12月22日重返爱爱寮治疗。历3个月18天，再押回牢狱，致伤势加剧恶化。1938年5月19日保外就医，拣回一条命，见到侵略者投降。台有关部门于1967年以台内民字第230117号令，给予褒扬。周乐斌生还后，回忆日刑警所施酷刑有：

1. 吊打，捆绑双手吊起脚不着地，每次12小时以上；用烧红铁线刺穿足底；把竹竿削尖捆成把，向胸背部乱戳；脱衣用沸水浇泼；用冷（冰）水浇身到湿透，不许脱换衣服；灌辣椒水；用粗木棒乱打等。

36. 林在发，福州人。赴台后在台北西昌街设皮鞋厂。参加中华会馆、三山善社和抗日救国会。1941年被捕，伤重保外就医。台湾有关部门于1966年12月21日以台内民字第220003号令给予褒扬。

37. 林家灼，闽侯县人，入台后，在抗战期间参加中华会馆抗日救国会工作。事泄被捕入狱，忍受酷刑，临难不屈。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协助政府接收工作。台湾有关部门于1960年10月发褒扬令，给予褒扬。

38. 林松根，福州人。在台参与反日抗日活动，被捕生还。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获台湾有关部门以台内民字第44607号令褒扬。

39. 吴迺洋，被捕生还，获台湾有关部门以台内民字第7722号令褒扬。

40. 王大水，被捕生还，获台湾有关部门以台内民字第1789号令褒扬。

41. 严锄非，被捕生还，获台湾有关部门以台内民字第7576号令褒扬。

42. 薛炳辉，被捕生还，获台湾有关部门以台内民178号及台内民字第0821号令褒扬，并台湾省府民褒字第028号奖状。

43. 许宝基，被捕生还。

44. 高享长（1882-1938），闽侯县人。富

有正义感，因故赴台避难，落籍屏东里巷乡太平村28号，开设宝美楼食堂。每见我国人被日人欺凌，总是义愤填膺，遂与众人联络共谋对抗之策。1925年，屏东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参加并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组织与宣传工作。出力又出钱，成为会馆得力干部。1937年，参加筹组抗日救国会，任宣传委员，积极开展反日活动。1937年12月7日，被捕入狱，备受各种酷刑，不屈不挠，还破口大骂侵略者。酷刑益甚，昏厥达七次之多。为求速死免遭毒刑，翌年3月14日受审时，突高喊反日口号，以头猛撞案角，血流如注。侵略者为掩饰其罪行，准其保外就医。因伤及脑内，加上刑伤，医治无效，于1938年7月15日亡故。1953年6月13日，获台湾有关部门明令褒扬。

45. 黄斯模（1894-1960），福州南门外连坂人。日据时期只身来台，落籍台北。正直清介，急公好义。参加中华会馆。抗日军兴，与中华会馆抗日志士一起，暗中搜寻敌人资讯情报。不幸于1941年10月19日被日警拘捕，同时被捕者一百余人。惨遭严刑酷打，其妹夫叶朝铨因此毙命于狱中。黄斯模有幸保住生命，至抗战胜利始出狱。两年后，妻与子女来台团聚。1960年1月逝世，享年67岁。

此外，庄依妹、雷歇梯、郑依在、池金官乃钱潭潭朋友，他们同时被捕，同时被害毙于狱中。这四位，从已知情况推理应为福州人。钱潭潭被捕时，凶狠的日警连同其妻柳氏，儿子少熊、少华一起拘捕。钱君遭害惨死后，妻子才释放回家逃过一劫。还有孙祥泰遭捕时，他的员工林世潘、邱祖培、宋振起三人同时被拘，并被打死在狱中。这三位一样可推理为福州人。

以上资料，录自陈秀夫先生于1952年4月撰写的《抗战时期旅台福州忠贞人士事略》一书，并《台湾三山善社八十周年纪念特刊》所作的补遗，以及台北福州同乡会会刊、《罗星塔》月刊等有关篇章。所录忠贞人士几十人，与实际史实相距甚远。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帝师陈

宝琛外甥林衡道教授，于1988年2月在129期《罗星塔》月刊上，发表《从“闽台一家”谈福州移民》一文，写道：“九一八事变后，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对中华会馆迫害层出不穷，而中华会馆的会员实际上都是福州人。……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方更是变本加厉，动辄以‘支那间谍’的名义，滥捕福州移民。往往关在牢狱中打死。”他建议：“福建省政府（台湾所设）似乎有必要在台湾，选个适当的地点，为殉难福州同乡立碑纪念。要不然，福州移民以前可歌可泣的事迹，日久为人所淡忘，就无法流传下来了。”陈秀夫也在其著作中说：“抗战时代旅台榕侨，受害最惨，死难最烈，忠贞悲壮事迹遍于全省。本书取材仅限台北、淡水之间一部分。”又说：“因赶于清明节前出版，撰稿时间不及一月，难免错漏。”台湾学者、福州人高啸云教授，1993年12月在《罗星塔》月刊199期发表《黄斯模先生在日据时期英勇抗敌》，文中写道：“与先生同时被捕有百余人，抗战胜利黄先生有幸生还出狱，往访昔日被捕同志，生还者不过两人而已。”综上所述，本文所录忠贞人士谱不过是冰山一角。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一手挑起中日大战。国难当头，客居在敌国直接管辖下台湾的福州人，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尊严，义无反顾地自发秘密组建反日抗日团体，由于背景特殊，无法得到内地社会各方面的声援和支持，极其艰难地与敌展开殊死的斗争。他们即使被拘捕，惨遭种种酷刑，也绝不低头屈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留下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遗憾的是，还有众多殉难者、生还者的芳名至今尚不知晓。笔者耄耋老矣，行将就木，仰赖后起之秀继续努力寻觅，还他们在抗日史上应有的地位。

附注：陈秀夫所著，在榕、厦、台等地经数月寻觅无果，后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袁乐同学指点，始知在美国芝加哥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有该书。又经转折，才获得陈氏著述的复印件。